

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組織運作之衝擊*

黃偉峰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台大國發所副教授

一般預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BFTAs) 會危害到多邊經貿組織的貿易自由化議程及其內部的組織運作 (簡稱危害說)。為此，本文運用大量原始檔案的內容分析結果，來試圖檢證亞太地區的 BFTAs 洽簽活動是否危害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的組織運作。首先，從言語重視程度來看，本文發現 APEC 各國領袖及資深官員可能會因 BFTAs 洽簽活動而較不關注 APEC 之貿易暨投資自由化核心議程，卻反而較強調 APEC 經濟和技術合作及能力建構之核心議程。然而，上述兩大核心議程在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的言辭重視中並非互斥關係。另外，從 APEC 組織運作的實際行動，即 APEC 工作計畫的執行來看，本文發現若特定年度任兩個配對國會向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登記 BFTAs，則其執行的 APEC 計畫數目較少，由此證實了「危害說」。然而，當在特定年度此組配對國向 WTO 登記 BFTAs 的累計數目越多時，則其所執行 APEC 計畫數目反而越多。此項發現意謂著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活動對 APEC 組織運作並不全然是負面的影響。尤其當各會員體之 BFTAs 累計數量愈多時，反而更願意執行 APEC 計畫來強化其 BFTAs 之政策方向。本文之發現因而修正了過去學界對此議題的理論假設。

關鍵字：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世界貿易組織、內容分析法、國際建制

* 本文之研究成果乃由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之經費補助而完成，特此申謝。此外，作者感謝中研院歐美所李瑞中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於本文的批評與指正。文中錯誤蓋由作者負責。最後感謝計畫助理蔡青嫻及潘致弘的協助。

收稿日期：99年5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10月25日

壹、前言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FTAs)之推動與擴散已被視為本世紀初「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發展(Dent, 2003, 2006; Ravenhill, 2003; Aggarwal and Urata (eds.), 2005)。¹然而,它對多邊經貿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之組織運作影響如何則尚無定論。學界曾對BFTAs是否為WTO貿易自由化的「奠基石」(building block)或「絆腳石」(stumbling block)進行論戰(Bhagwati, 1992; Lawrence, 1996; 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 Lee and Park, 2005);亦曾將BFTAs的影響區分成「區域匯合之雙邊主義」(region-convergent bilateralism)和「區域離散之雙邊主義」(region-divergent bilateralism)(Dent, 2006)。前者認為BFTAs的擴散造成「競爭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的壓力,因此有益於區域,甚至全球貿易自由化(Bergsten, 1994; Baldwin, 1997; Zoellick, 2001)。據此,BFTAs與多邊經貿組織應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但後者則指出BFTAs的排他性常與多邊組織的非歧視性之自由化宗旨不符:BFTAs不但在關稅上歧視第三國,也形成多重且複雜的市場准入規則(例如不同的原產地規則,或長短不一的落日條款等),不利於自由貿易(Bhagwati and Panagariya, 1996; Brown et al., 2003; Frankel, 1997: 112-113)。依此論述,BFTAs之發展將削弱多邊經貿組織的功能,並危害其運作。

就APEC而言,會員經濟體間所談判或已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多被認為是危害到APEC的組織運作;然而仍有學者認為,因為BFTAs預先為泛區域貿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礎(Bergsten, 2000),使得亞太區域內BFTAs之洽簽活動仍與APEC所揭櫫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s)得以相契合。儘管自2000年以來,APEC領袖宣言持續宣稱BFTAs符合其組織的宗旨目

1 本文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是指廣義的「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且兩造締約方可以是單一國家與單一國家、單一國家與區域組織,或區域組織與區域組織。本文所謂的「亞太地區」依研究需要僅包括東亞、大洋洲暨太平洋岸美洲國家,但不包括中亞和南亞國家。

標，且與此同時 APEC 早已頒布了「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 綱領，以使會員經濟體洽簽 BFTAs 或次區域 FTAs (subregional FTAs, SRTAs) 時有所依循，不致違背 APEC 之「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 的精神；² 但是從 APEC 會員經濟體所談判或洽簽之 BFTAs 內容觀之，鮮少有 BFTAs 遵循 APEC 之開放性和非歧視性原則的例子 (Dent, 2006: 243)。不但如此，學界大多認為 BFTAs 的談判、洽簽與執行將轉移 APEC 領袖的注意力，使得會員經濟體的技术官僚不勝負荷，疲於奔命；並耗損會員體內之稀有行政資源 (Ravenhill, 2003: 312)。依此論述，BFTAs 洽簽活動已竊占 APEC 的核心議程及資源，使得原已弱勢的 APEC 建制更加空洞化，並讓 APEC 貿易自由化議程顯得多餘且無關緊要 (Dent, 2006: 245-246)。

雖然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 BFTAs 不利於多邊經貿組織的發展，甚至阻礙其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但是針對 BFTAs 是否衝擊以及如何衝擊多邊經貿組織的內部制度運作卻鮮少提出具體的證據加以論述。本文的目的在於彌補過去研究的缺憾，以系統性資料檢視 BFTAs 對 APEC 組織運作之衝擊，運用筆者過去數年所蒐集的 APEC 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 16 件領袖宣言 (1993-2008)，59 件資深官員會議記錄摘要 (1990-2008)、2144 筆 APEC 所公告的活動和會議 (1995-2008)，及 1256 筆 APEC 所執行的計畫書 (1993-2008) 文本等，進行分類及內容分析 (有關內容分析之分類編碼，參見附錄)。筆者希望能從實證資料上論斷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與談判活動是否削弱 APEC 既有的組織運作？又 APEC 的組織運作是否因 BFTAs 洽簽活動而有所調整？

2 有關 APEC 領袖宣言的內容，請參考 *Leaders' Declaration of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Summit* (APEC, 2010d)。有關 APEC 針對 BFTAs 及次區域 FTAs (SRTAs) 所頒布的「最佳實踐」綱領，可回溯至 1995 年 APEC Eminent Persons Group 的報告。為使 BFTAs 或 SRTAs 與 APEC 組織宗旨相符，該報告建議下列實踐準則：(1) 盡最大可能進行片面自由化 (unilateral liberalization)；(2) 堅持承諾對 BFTAs 或 SRTAs 成員及非成員降低貿易障礙；(3) BFTAs 或 SRTAs 成員在互惠基礎上應將所有因 BFTAs 或 SRTAs 自由化所獲致的利益，提供給其他 APEC 會員經濟體；(4) 承認任一 BFTAs 或 SRTAs 成員可以片面且無條件地將其貿易自由化的條件和利益延伸至其他所有 APEC 會員，或有條件地延伸至某單一或數個 APEC 會員經濟體。見 APEC (1995), *Implementing the APEC Vision: Third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Singapore, APEC Secretariat)。

APEC 領袖是否因 BFTAs 洽簽活動而不再專注於 APEC 核心議題？本文將透過經驗資料的檢證，初步釐清 BFTAs 與 APEC 在理論上的辯證關係。本文除前言外，第二節描述亞太區域自 1997 年來，各國積極洽簽 BFTAs 的活動概況，並探討其可能對多邊貿易組織之衝擊。第三節，檢閱既有文獻指出 APEC 組織運作的特色。第四節，爲了發展 BFTAs 對 APEC 組織運作衝擊之假設，則透過領袖宣言、資深官員會議記錄摘要及 APEC 計畫文本之內容分析，有系統地檢視 APEC 組織運作的兩大核心議程，即「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TILF) 和「經濟和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Ecotech) 之時序變遷。³ 並以 1999 年做爲分野，初步研判 1999 年後 BFTAs 之盛行是否改變 APEC 核心議程的言辭重視與實際運作？第五節筆者根據上節研判所發展出的假設，以多元迴歸分析來探討 BFTAs 的洽簽活動及其數目的累積，是否會改變或削弱 APEC 核心議程之實際運作？第六節則爲結論，細究本文實證分析結果的理論意涵，並修正目前就 BFTAs 對多邊經貿組織之影響的理論假設。

貳、亞太區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繁衍與衝擊

根據「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及 WTO 的登記資料，截至 1990 年全球只有 40 個自由貿易協定；到了 1997 年，全球的 FTAs 數目增至 72 個。又至 2005 年底，FTAs 數目已達 153 個，其中百分之九十本質上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Dent, 2006: 24)。最新 WTO 登記資料顯示 (截至 2009 年 7 月 27 日) FTAs 的總數增至 414 個，其中 249 個 FTAs 已生效。在已生效之 FTAs 中有 153 個乃根據 GATT 第 24 條規定通報

3 學界一般將 APEC 核心議程分成三類，即「貿易投資自由化」、「貿易便捷化」和「經濟和技術合作」三類。本文簡化分類成「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及「經濟和技術合作」兩類。主要是因爲 APEC 會員體對於 APEC 發展之優先順序有歧異。APEC 已開發國家較重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但開發中國家則較重視經濟和技術合作及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此外，APEC 工作計畫之資金來源亦大致可分成 TILF Fund (1997 年後) 及 Operation Fund，前者大多支付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後者大致則支應經濟和技術合作 (見 Ravenhill, 2001: 155)。

的 (WTO, 2009)。然而當全球各地 FTAs 皆快速繁衍時，我們發現在 1997 年底，東亞區域尚無任何國家簽署 BFTAs；若將地理範圍擴大至亞太區域（包括東亞、大洋洲及太平洋岸美洲國家），則亞太國家已簽署 BFTAs 的數目也不過 7 個，約占當時全球 BFTAs 數目（72 個）之 14% (Dent, 2006: 2-3)。自 1998 年起亞太區域 BFTAs 的洽簽與談判活動快速繁衍。首先，在 1998 年 11 月，有南韓／智利、日本／南韓，與南韓／泰國三個 BFTAs 計畫正式啓動 (Dent, 2003: 9)。隨後在 1999 年，亞太國家宣布推動 8 個新的 BFTAs 計畫，其中 6 個 BFTAs 計畫與新加坡有關。在 2000 年，另外 4 個新的 BFTAs 計畫在亞太區域正式啓動，同時「新加坡／紐西蘭更緊密經濟伙伴協定」(New Zealand-Singapor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NZSCEP) 業亦已完成談判，正式簽署。又在 2001 年及 2002 年，亞太國家分別宣布推動 8 個暨 9 個新的 BFTAs 計畫；而且至 2002 年底，亞太區域的國家已簽署了 19 個 BFTAs (Dent, 2006: 12)。到了 2005 年 12 月亞太國家所談判及洽簽之 BFTAs 計畫數目共 67 個，其中有 38 個 BFTAs 已完成談判或簽署的工作。又與東亞國家洽簽或談判的 BFTAs 計畫共 47 個，其中有 17 個 BFTAs 是東亞國家彼此之間所推動的計畫 (Dent, 2006: 15)。Baldwin 依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簡稱亞銀) 的報告指出，截至 2007 年 1 月止亞太地區國家所洽簽及談判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共 172 個，約占當時全球所洽簽及談判 BFTAs 數目的一半 (Baldwin, 2008: 51)。不過，亞銀的統計數據所稱之「亞太區域」包括中亞及南亞國家，但卻不包括太平洋岸美洲國家，因此並無法與上述 Dent 的資料相比較。爲了兼顧資料更新與比較研究所需，筆者將亞銀及 WTO 所公佈截至 2009 年 6 月的 BFTAs 資料，依本文所定義的「亞太地區」重新整理，並將結果呈現於表 1。

如表 1 所示，亞太國家以新加坡最熱中於談判洽簽 BFTAs。截至 2009 年 7 月，新加坡談判及簽署的 BFTAs 數目共有 29 個。談判與簽署 BFTAs 的數目居次之國家是美國，共 20 個。泰國亦有 18 個 BFTAs 刻正談判或已簽署，中國、日本和馬來西亞各自所談判和簽署之 BFTAs 皆爲 16 個。太平洋東岸國家如加拿大和智利各自協商與簽署執行 BFTAs 的數目爲 18 個和 17 個。大洋洲國家如澳洲和紐西蘭各自談判和簽署之 BFTAs 的數目也達 14 個和

表 1：亞太國家 FTAs/RTAs 之洽簽與談判活動概況（截至 2009 年 6 月止）

國 家	提議	談判協商	已簽署與執行	總計
印尼	6	3	7	16
馬來西亞	3	8	8	19
菲律賓	4	2	6	12
新加坡	4	10	19	33
泰國	6	8	10	24
越南	2	3	6	11
汶萊	4	2	7	13
中國	7	6	10	23
香港	0	1	1	2
日本	4	5	11	20
韓國	8	9	6	23
紐西蘭	4	4	7	15
巴布亞新幾內亞	1	1	4	6
中華台北	1	2	4	7
澳洲	5	6	8	19
澳門*	0	0	1	1
美國*	0	3	17	20
加拿大*	0	9	9	18
墨西哥*		1	14	15
智利*		0	17	17
秘魯*		2	5	7
俄羅斯*		0	7	7
哥斯大黎加*		0	6	6
瓜地馬拉*		1	3	4
尼加拉瓜*		1	4	5
巴拿馬*		1	4	5

資料來源：

1.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sia Development Bank (2010) <http://www.aric.adb.org/>
 2. *RTA Databas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formation System (RTA-IS)* (以下簡稱 *RTA Databas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0)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 註：(*)號之資料來源為 RTA database, WTO；非(*)號資料來源為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DB。

11 個。若從已簽署且刻正執行的 BFTAs 數目來看，新加坡為最多，共有 19 個。其次則為美國及智利，其完成簽署之 BFTAs 數目皆為 17 個。再來為日本的 11 個及中國和泰國的 10 個。中華台北已完成簽署之數目則有 4 個。若就提議或刻正協商部分來看，韓國數目為最多，共有 17 個，再來則為新加坡及泰國的 14 個和中國的 13 個。表示上列國家未來完成簽署 BFTAs 的空間仍大。⁴

圖 1（見下頁）以 APEC 會員經濟體為主體，探討其彼此間所談判洽簽的 BFTAs 現狀。如圖 1 所示，截至 2009 年，若不計 AFTA、NAFTA、及 AUNZFTA 內部會員間的協定，則 APEC 會員經濟體彼此間已簽署並執行中之 BFTAs 數目共有 25 個，談判中之 BFTAs 數目亦有 16 個，另外有 4 個 BFTAs 處於提議和討論的階段。APEC 會員中以智利和新加坡最熱中於 BFTAs，分別與其他會員經濟體已簽署了 9 個和 6 個 BFTAs。反觀俄羅斯與中華台北在此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⁵

若比較東亞兩大強權日本與中國的 BFTAs 洽簽活動，純就數量來說，中國已與其他 APEC 經濟體所簽署之 BFTAs 數目（4 個）領先日本（2 個）。也許正因為此，日本一改過去的多邊主義策略，積極尋求與其他 APEC 會員經濟體洽簽 BFTAs（MITI, 1999）。如圖 1 所示，日本與墨西哥和新加坡分別簽署了 BFTAs，同時亦與智利、泰國、韓國和東協等談判 BFTAs。另提議討

4 由於 ADB 資料不含太平洋岸美洲國家，而 WTO 資料則未列「提議」之 BFTAs，故這部分的比較排序仍有偏差。文中敘述僅就 ADB 資料做比較。

5 中華台北因外交孤立，目前除了與美國洽談「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與中國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又目前與新加坡共同宣布進行先期研究外，也尚未與任何 APEC 會員經濟體簽署 BFTAs。有趣的是在中國的「一國兩制」管制下之香港已與中國簽署了「更緊密的經濟伙伴協定」(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且香港與紐西蘭的 BFTAs 談判也已完成。雖然中華台北尚未與任何 APEC 會員經濟體（除中國外）談判或簽署 BFTAs，在圖 2 我們發現其與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皆已簽署 BFTAs；這些中美洲國家皆為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之邦交國，且雙邊貿易量不多，加上「中華台北」極欲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避免經濟遭邊緣化，故使得「中華台北」願意盡其所能以取得簽署 BFTAs 的機會。所以從洽簽 BFTAs 活動來看，我們在圖 2 發現中華台北的表現遠較其在圖 1 的表現為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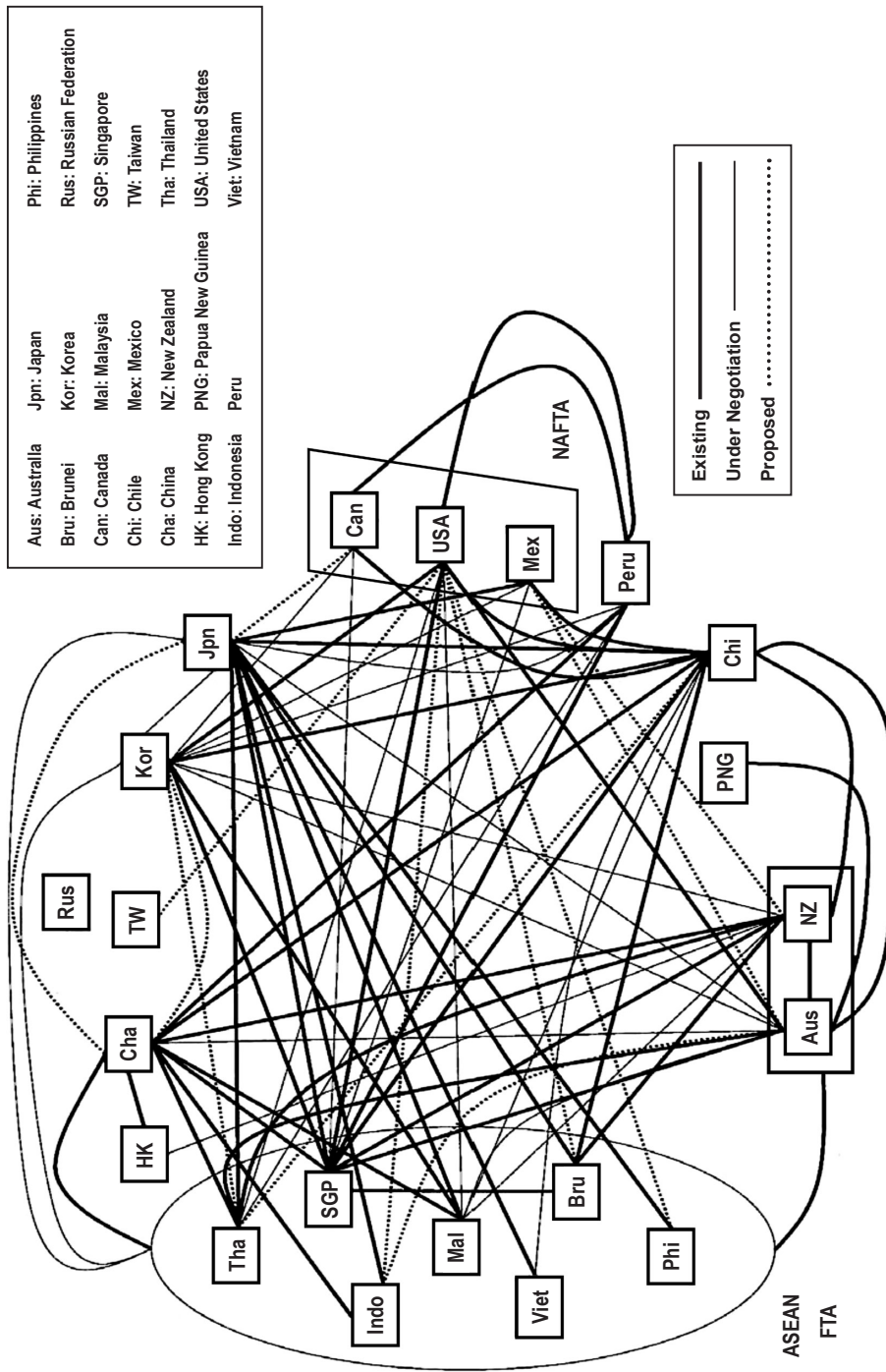


圖 1：APEC 會員間彼此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狀況（截至 2009 年）

論中的 BFTAs 亦包括日本與加拿大 BFTAs，以及日本與澳洲 BFTAs。除了日本與中國外，其他 APEC 會員經濟體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韓國、秘魯、和智利皆積極在彼此間從事 BFTAs 之談判洽簽活動，於是建構出圖 1 般綿密羅織的 BFTAs 網絡。不但如此，BFTAs 在其他區域的快速增長及擴散，也迫使 APEC 會員經濟體與非會員談判洽簽 BFTAs。

如圖 2（見下頁）所示，APEC 會員經濟體與非會員間所談判和洽簽之 BFTAs 更加繁多，其所建構的關係網絡亦非常綿密。其中以東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 APEC 會員體最為積極。像泰國、新加坡、墨西哥、加拿大、及美國等國不論是提議討論中的 BFTAs，或是談判及已簽署 BFTAs 之數目皆非常的多。比較圖 1 所呈現的狀況，在圖 2 我們仍發現智利是最積極談判和洽簽 BFTAs 之國家。反倒是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與非 APEC 會員間的 BFTAs 洽簽活動明顯較少，顯示上述各國之 BFTAs 洽簽活動仍以 APEC 會員經濟體為主。

雖然各國自 1990 年代末期便熱中於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與洽簽實來自多重考量，但一個重要的考量是多邊經貿組織無法發揮既定的功能。的確，2003 年 WTO 報告承認其本身的多邊貿易自由化的進展緩慢，促使各國紛紛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做為政策保險（WTO, 2003）。然而，BFTAs 的談判與洽簽是否進一步危害到多邊經貿組織的內部核心議題之運作呢？Bhagwati 的研究指出不論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是區域自由貿易區對於多邊經貿組織及其經貿談判議程都具有負面影響。原因如下：第一、BFTAs 的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效果很小，但貿易轉移（trade divergent）效果卻很大。第二、BFTAs 在實踐上需要複雜的原產地規則，徒增企業的交易成本，不利於貿易。第三、BFTAs 的談判及洽簽會轉移原已稀少的行政資源，使得多邊經貿談判變得更不可行。第四、BFTAs 在本質上會歧視第三國，因此應視為優惠協定（preferential agreements）。最後，由於 BFTAs 的擴散及繁衍，使得各國貿易運作規則日益複雜，難以相容整合，實不利於自由貿易。Bhagwati 稱之為「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Bhagwati, 1992）。

儘管 GATT 第 24 條（Article XXIV）有條件地允許各國簽訂 BFTAs，即各該 BFTAs 皆必須在實質上消弭會員彼此間的所有貿易障礙，而且整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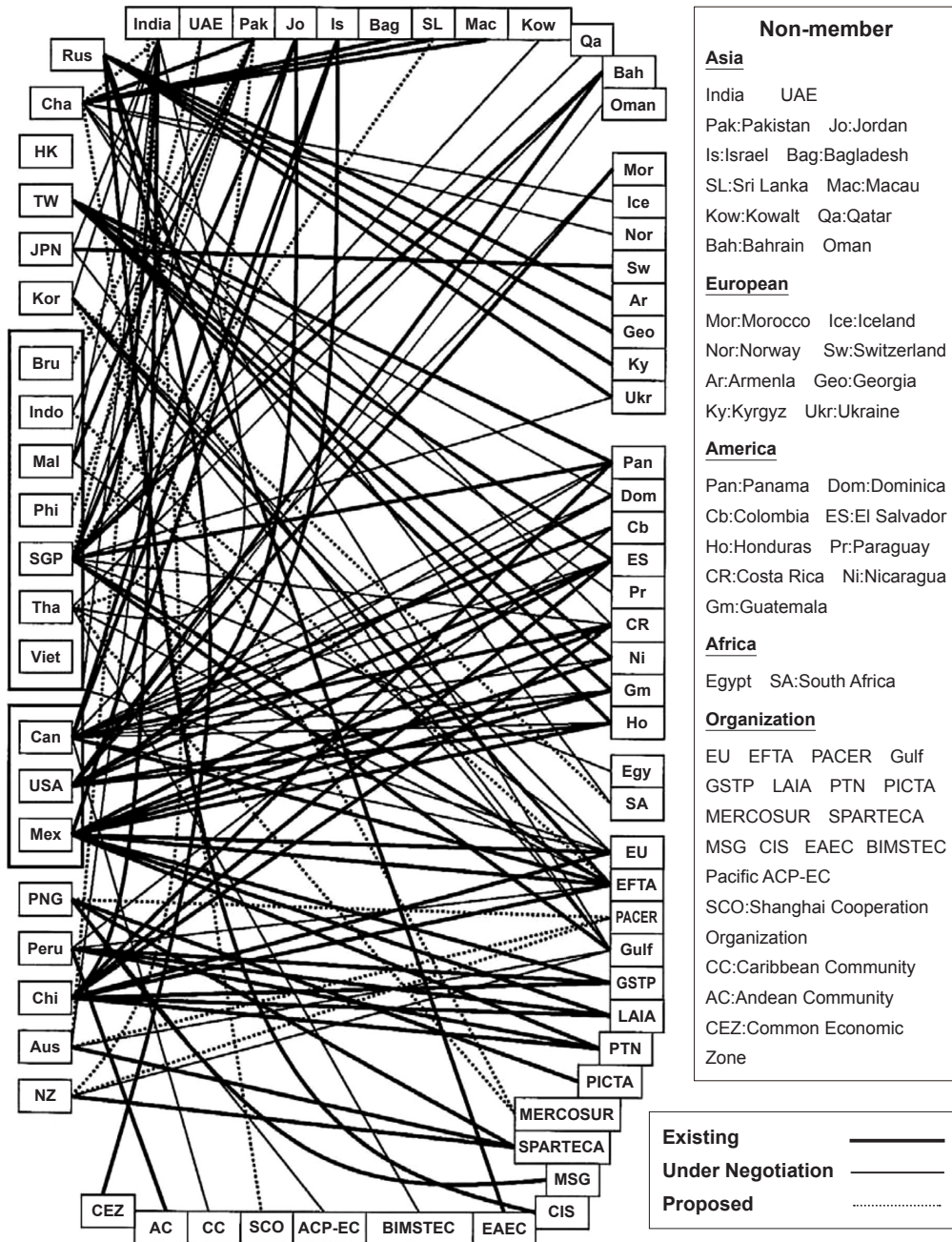


圖 2：APEC 會員與非會員間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狀況（截至 2009 年）

資料來源：1. “Proposed” for FTAs/RTAs are retrieved from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sia Development Bank (2010) <http://www.aric.adb.org/>

2. *RTA Databas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0)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on the whole) 不致於對第三國徒增保護主義障礙。但實務上各國對於何謂「實質」(substantially)，何謂「所有貿易」(all trade)，及何謂「整體上」等詞皆有不同的定義，據此也與 WTO 的「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爭論不休。致使該委員會幾乎無法裁定任何向其通報之 BFTAs 有否違背 WTO 之相關規定。誠如 WTO 官員 Gary P. Sampson 所言：「歷史已經證明此 (Article XXIV) 乃 GATT 程序規則中最令人不滿意之條文」(Sampson, 1996: 90)。尤有甚者，各國簽訂之 BFTAs 在實際操作上皆違反 WTO 第 24 條規定，嚴重歧視非締約之第三國產品。例如：德國在 1958 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其對第三國的平均關稅 (average tariff) 已增加一倍。即使 BFTAs 本身並無對第三國之歧視條款，但其存在已造成貿易轉移效果，使得第三國企業的競爭力相對降低。更何況除了固定關稅的歧視外，Baldwin 指出 BFTAs 的經濟效應還包括資源的「配置效果」(allocation effect)，經濟活動的「地點效果」(location effect)，以及經濟成長要素的「累積效果」(accumulation effect)。上述效果的扭曲不但妨礙經濟資源的最有效配置，而且易造成「核心放射狀的貿易安排」(hub-and-spoke trade arrangement)，進而使得經濟上屬於邊緣的弱勢國家，更加的邊緣化 (Baldwin, 2008)。

相對於上述對 BFTAs 之負面看法，Schiff 和 Winters (2003) 的研究發現，當 BFTAs 的簽署國僅限於發展中國家時，則其貿易創造效果相當顯著，且其貿易轉移效果幾乎不存在。但若 BFTAs 之簽署國牽涉到已發展國家時，則其貿易轉移效果的確很大的。究其原委可能是已發展國家之締約方的關稅原已很低，故因 BFTAs 而再降關稅之空間有限。是此其貿易轉移效果變得相對顯著。此外，Scollay 和 Gilbert (2001) 的模擬分析發現當所有 BFTAs 皆列入考量時，則其貿易創造效果大於貿易轉移效果。不過他們也指出 BFTAs 締約國與非締約國的貿易量會隨著 BFTAs 的執行而降低。這顯示 BFTAs 的確有歧視第三國的效果。但總體而言，Scollay 和 Gilbert 的研究認為 BFTAs 對世界貿易是有正面影響的。

由上述諸多實證研究可知，BFTAs 對貿易自由化的推廣及其福利效果仍尚無定論。可是這些研究並未討論 BFTAs 對既有多邊經貿組織之運作造成何種衝擊。Bhagwati 僅指出 BFTAs 之洽簽談判活動會轉移原已稀有的行政資

源，但並未討論這種行政資源的轉移如何危害到既有多邊經貿組織的運作。雖然 John Ravenhill 指出 1990 年代末期便與方興未艾的雙邊或「極少邊」(minilateral) 自由貿易協定最可能危害 APEC 及 WTO 的組織運作。但他承認這些為數眾多「極少邊」自由貿易協定如何轉移會員體的既有行政資源仍僅是「印象式」(impressionistic) 陳述，也仍為各界激辯中 (Ravenhill, 2007)。又本文所檢視之既有文獻皆未提出具體證據來論證 BFTAs 對既有多邊經貿組織運作之利弊得失，僅「假定」或「推論」其組織運作會受到 BFTAs 洽簽活動所影響。為了更明確地檢證這些「假說」和「推論」，本文以 APEC 為例，首先於下節檢閱既有文獻，指出 APEC 組織運作的特質。再於第四節釐清會員體的 BFTAs 洽簽活動與 APEC 組織運作關聯的可能假設。

參、APEC 組織運作之文獻回顧

國內外針對 APEC 的歷史演進、組織發展、制度改革和實務運作的文章及專書已多到不勝枚舉，汗牛充棟之地步 (APEC, 2010a; 吳榮義, 2008; 吳玲君, 1997, 1998; 詹滿容、江啓臣, 2002; 李瓊莉、徐斯勤, 2005; 江啓臣, 2007; 洪德生、江啓臣, 2006; 廖舜右, 2003; 周子欽, 2007; Aggarwal and Lin, 2001; Aggarwal and Morrison, 1998; Higgott and Stubbs, 1995; Wesley, 2001; Dent, 2008; Corbet, 1995; Feinberg (ed.), 2003; Feinberg, 2008; Yamazawa, 2000)。因篇幅所限，本文僅針對 APEC 組織運作的特性進行文獻回顧。APEC 自從 1989 年創立以來便排斥以歐盟 (EU) 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為典型的「封閉式區域主義」(closed regionalism)，並刻意避免走向類似歐盟之超國家主義 (supranationalism) 的運作模式。反映在組織特色上，便是 APEC 所揭櫫的「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 和「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 兩大核心原則。落實其組織運作綱領上，則是 APEC 所強調的「漸進式」(incrementalism)、「自願性」(voluntarism)、「共識決」(consensual decision) 及「非拘束力」(non-binding) 等原則。所謂「開放性區域主義」一方面是指區域組織的產出結果是開放的；另一方面是指達成區域組織目標的方法也可以是開放的 (Drysdale et al., 1998)。前者指 APEC 會

員體就其彼此間所做的關稅減讓及貿易障礙之排除，「原則上」是開放給非會員體來分享的。後者指即使 APEC 會員體對於貿易自由化之目標有共識，但對於達成目標的實踐方法則開放給會員體各自依其產業需要和經濟結構來決定。APEC 對於開放進度落後或故意怠忽職守之會員體並無法律拘束力，更無強制懲罰的權力。準此，APEC 會員體仍牢牢地掌握主權。APEC 以共識決形成政策目標，但對於共同目標的執行方法、步驟、速度及時機，各會員體則依其本身條件自願地、片面地、漸進地去進行。APEC 及其他會員體並無任何法律強制力去迫使任一會員體執行 APEC 政策或目標。這與歐盟的高度「法制化」(legalization) 之組織結構有很大差異 (Goldstein et al. (eds.), 2001)。又與歐盟會員國分攤共儲主權 (pooled sovereignty) 於超國家組織 (即執委會、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等) 之運作模式亦有天壤之別 (黃偉峰, 2003; 張亞中, 1998; Sandholtz and Stone, 1998)。

APEC 於 1989 年創立之初即對其組織發展存在兩條路線之爭 (Higgott and Stubbs, 1995; Gallant and Stubbs, 1997; 李瓊莉、徐斯勤, 2005)。這兩條區域主義的路線可以統稱之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及「亞洲觀點」(Asian View) (Gallant and Stubbs, 1997: 204-206)。倡議「新自由主義」的會員體 (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 強調個人福祉極大化，主張自由市場運作不受任何外來干預；政府角色僅止於提供公共財和維持自由市場運作。反映在國際經濟上，該路線認為政府應促進自由貿易，並排除資本及貨品流動之貿易障礙。其手段則是透過政府間談判，尋求具拘束力和強制力的國際協議和規範，有系統地排除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反觀，「亞洲觀點」的倡議會員體 (如東協國家，和中國、日本、韓國等) 強調團體 (group) 或社群 (community) 才是社會最重要的組成單位。個人利益應置於社群利益之下。雖然亞洲各國政府權威頗受人民敬畏，但政府亦有義務尋求社會共識以推動政策。在經濟政策上「亞洲觀點」倡議者重視政府與企業關係，主張政府應積極介入市場促進經濟發展。企業發展及商業運作則是透過彈性且非正式的關係網絡 (informal networks) 來促成的。反映在 APEC 組織運作上，「亞洲觀點」倡議者偏好共識決，強調包容彈性，建立互信，重視演化過程，講求自願且非拘束性的單邊行動，並務實協調彼此行動以達成共同目標。

在「亞洲觀點」倡議者之堅持下，APEC 組織運作大致依循 1995 年的「大阪行動準則」(Osaka Action Agenda, OAA) 來進行。所謂 OAA 的行動準則是指彈性原則、全面性原則、合作原則、區辨時間表 (differentiated timetable)、持續進步原則、同時開始和靜止原則、透明原則、可比較原則、WTO 相容性原則，以及非歧視原則。一般認為 OAA 的行動準則構築 APEC 會員體互動的誘因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可是 Ravenhill 卻批評 OAA 各項行動準則常常自相矛盾，致使 APEC 窒礙難行 (Ravenhill, 2001: 157-159)。例如「全面性」原則和「彈性」原則乃相互矛盾。OAA 要求會員體「全面性」(不得有例外地) 開放市場，但「彈性」原則即允許會員體保留特定敏感產業 (如農業) 不列入市場開放之清單，於是違背全面性原則。又如「同時開始或靜止」原則與「區辨時間表」並不相容。前者旨在體現「協調式單邊主義」之精神，使得會員體行動趨同，但「區辨時間表」卻使得行動趨同可以有所差異。

由於「亞洲觀點」路線在 APEC 組織運作的實踐上居主導地位，但 APEC 目標擬定卻又反映「新自由主義」路線 (例如：1994 年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於是 APEC 頗具雄心的貿易自由化目標常常造成外界過高的期待，可是在具體實踐上卻往往無法如期達成。這便造成「認知／能力落差」(perception/capability gap)，也是 APEC 組織運作的兩難困境 (dilemma) (Gallant and Stubbs, 1997)。更糟的是 APEC 會員體為尋求共識而往往使用模稜兩可的語彙，致使所達成之共識目標皆能各取所需，各自詮釋。舉例來說，1994 年「茂物目標」中所有會員體承諾於 2010/2020 年前達成「全面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就此，已開發國家，如美、加、澳、紐等是指去除所有關稅和非關稅之貿易和投資障礙。但開發中國家，如東協則傾向將關稅降至 5% 以下，便等同於達成貿易自由化目標 (Ravenhill, 2001: 159)。又如在 1997 年「早期自願產業別自由化」(EVSL) 政策上，會員體對於「自願」的定義便爭論不休。有些會員體認為「自願」性使其可以自由挑選 15 項 EVSL 產業的其中幾項來開放；另有些會員體則認為「自願」性使其可以自由選擇開始施行的時間；亦有會員體認為「自願」性允許其自由採行不同的降稅方式 (Wesley, 2001: 196)。換言之，即使 APEC 會員體形成政策目標的共識，但各自卻保留不同詮釋和執行的空間，致使 APEC 組織運作常是說的比做的多。

更何況 APEC 路線之爭常造成政策目標的分歧。雖然兩路線倡議者大致同意 APEC 應專注於經濟議題，但對於經濟議題的優先順序則無共識。「新自由主義」倡議者偏好「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TILF) 議程。一方面設定達成貿易自由化目標之終極年限(如茂物目標之 2010/2020 年)；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不同工作小組提出協調通關程序之機制，或建立爭端解決機制，使得 APEC 會員體間貿易和投資更加順暢。反觀「亞洲觀點」倡議者如馬來西亞則主張 APEC 應重視「經濟和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ECOTECH)。特別是 APEC 的開發中會員體亟需經濟發展的協助。這些國家認為只有當其經濟發展達到相當程度後，再談市場開放才有意義。而且開發中的會員體往往基礎建設不足，且司法和行政能力有限，根本無法勝任複雜且繁瑣的貿易自由化談判。因此，「亞洲觀點」倡議者認為 ECOTECH 和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 才是 APEC 應優先處理的議程。(Ravenhill, 2000; Gallant and Stubbs, 1997: 215; 李瓊莉、徐斯勤, 2005)

除了議程路線和組織發展之爭外，APEC 的成員眾多和議題繁複也令人懷疑，到底 APEC 能否如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般地運作呢？依 Krasner 的定義，國際建制是指「行為者在國際關係特殊領域之期待趨合後所衍生出的一套隱性或顯性原則、準則、法規，及決策程序。」(Krasner, 1983: 2) 據此定義，詹滿容及江啓臣認為 APEC 做為國際建制的特色在於「以互利開放為原則」、「以自願主義為準則」、「共識建立的決策程序」、和「非拘束性的規範」(詹滿容、江啓臣, 2002: 17-19)。吳玲君則認為 APEC 歷經多次會議運作，「確實已從一個原本鬆散及對話性質的論壇發展成為較有制度、有組織及功能的會議。……雖說 APEC 的決議並沒有嚴格的拘束力，但是由於各會員體都重視 APEC 各項會議的決議原則與達成的共識，……(因此) 具備所謂『建制』的基本條件」(吳玲君, 1998: 3)。不過從 APEC 處理 1997-8 年東亞金融危機來看 APEC 建制仍流露以下特點，即「論壇性的本質不具約束力」，「議題涵蓋範圍過大」，和「政治因素的考慮與主導權之爭」(吳玲君, 1998: 9-11)。李瓊莉和徐斯勤以為「APEC 作為一個亞太區域性國際建制，其有別於一般國際建制之處，不僅顯現在成員規模與議題範圍上前所未有的

廣泛性，更在於其實行多邊合作之模式與決策機制方面的獨特性。」（李瓊莉、徐斯勤，2005: 49-50）他們整理出 APEC 建制的幾項特色，即「開放性區域主義」、共識決、不干預原則、非正式規則重於正式制度、單邊自願性順服、以及論壇模式（李瓊莉、徐斯勤，2005: 50）。

儘管 APEC 具有上述學者指出的「國際建制」特色，但這些特色是否組合成一套可運作的誘因結構，促使會員體協調或制約彼此行為而達成共同目標呢？仔細來說，APEC 的組織特色是否可以發揮「國際建制」的三大效果呢？即 APEC 是否能改變會員體的合作誘因（如透過監控、互惠、懲罰、降低交易成本、議題連結、重複賽局等）？APEC 是否能改變會員體的利益和認同（如透過知識創新和擴散、擴大政策選項、建構和重塑對自身利益的認知和制度行動能力）？APEC 是否能改變會員體內部的政治經濟的均勢（如強化改革派力量，鎖住國內改革路徑，使政府因手腳束縛而展現可信承諾）（Rittberger and Mayer (eds.), 1993; Ravenhill, 2001）？較樂觀者認為 APEC 做為一個弱勢（weak）國際建制固然不能發揮所有國際建制的效果，但它的確擁有某些國際建制的合作誘因，足以協調和規範會員體在 APEC 內的互動（黃偉峰，2005）。首先，APEC 雖然在達成目標的方法上開放給會員體自行決定，故表面 APEC 會員體仍具完整主權。可是 APEC 制度設計本身便是個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而非單一賽局。故個別會員體並無法長期採片面背棄合作方式來掠奪其他會員合作的成果。在無限重複賽局中，我們知道「以牙還牙」（tit-for-tat）策略是足以在無外來第三者懲罰的情況下引發行動者自動自發的合作（Axelrod, 1984）。而且在重複賽局中，建立行動者的良好聲譽比短期因不合作而得利來得重要（Bowles and Gintis, 1998）。

而上述這些制度性誘因著實在 APEC 重複賽局中彰顯無遺。APEC 運用密集會議，頻繁互動和合作計畫來迫使其會員國置身於複雜又頻繁的重複賽局中。雖然 APEC 各會員體可以不參與某一 APEC 計畫，也可以對會議結論援引例外或自願原則，但是若個別 APEC 會員在大多數的會議及計畫中經常且持續援引例外，則在其他會員的眼中，它似乎不遵守互惠的原則，久而久之，該會員便容易被邊緣化。因此，在 APEC 密集的重複賽局中，建立聲望，互利互惠的誘因迫使會員國合作。而且從密集且廣泛的互動中，APEC 會員

也能相互學習、建立互信、瞭解對方真正偏好意圖，並體會 APEC 共同目標所帶來的利益，進而自願改變偏好去迎合 APEC 共同目標。的確，大部份學者將 APEC 建制的效果限縮在知識和認知的擴散 (cognitive diffusion)，會員體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議題的設定和擴張 (agenda setting and expansion) (Aggarwal and Lin, 2001: 178-182; Feinberg, 2008: 248-254)。例如，有研究發現積極參與 APEC 活動的外交和經貿部會之技術官僚對於區域經濟議題持有較類似的認知。又如一向偏好進口替代政策的中國和東協國家也逐漸放棄該政策。同時 APEC 所有會員體也似乎邁向私有化及法規鬆綁的政策 (Aggarwal and Lin, 2001: 181)。

當然，APEC 組織制度仍有改進的空間，這也是近來 APEC 會員體特別重視 APEC 的制度改革 (洪德生、江啓臣，2006)。各種攸關 APEC 制度改革的芻議也蜂擁而至。例如 2003 年澳洲提出五項 APEC 改革意見，其重點主張 APEC 應該由上而下讓領袖會議來設定議程並設立具備倡議、修正與指導領袖會議議程之機制。同時韓國也提出三項 APEC 改革意見，重點在於評估 APEC 之結構，活動與秘書處。日本指出 APEC 改革必須是成果導向的改革，即 APEC 的活動與計畫必須產出明確成果。加拿大希望 APEC 資深官員會議能簡化議程，並強化 APEC 秘書處與其他國際組織的互動。不過 2003 年 SOM III 會議的結論仍主張維持共識決的精神，保持 APEC 精簡與非官僚組織架構，強化 APEC 秘書處之核心支援機制，釐清 APEC 改革的制度性層次和實質性層次問題 (廖舜右，2003: 174-185)。換言之，APEC 組織制度的大變革並未實現。其運作規則和程序僅有零星的變動。例如，爲了降低啓動新 APEC 計畫的會員體數目門檻，APEC 在程序上創新引進「探路」(pathfinder) 程序。該程序採行仍須獲所有會員體之一致共識，可是一旦採行「探路」程序，則只需 25% APEC 會員體承諾參與計畫，則該計畫便可率先實行。過去 APEC 已批准諸項「探路計畫」，如相互承認食品標準，資料隱私的處理、企業治理，和開放數位經濟等計畫 (Feinberg, 2008: 253)。此外，雖然 APEC 會員體不願擴編其秘書處官僚人數，但爲使其有效率地運作，APEC 於 2007 年雇用一常任的秘書處主任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OO)，並在秘書處下設一「計畫管理單位」(project management unit) 及「政策支援單位」(policy support

unit)，用以更有效率的推動 APEC 工作計畫（Feinberg, 2008: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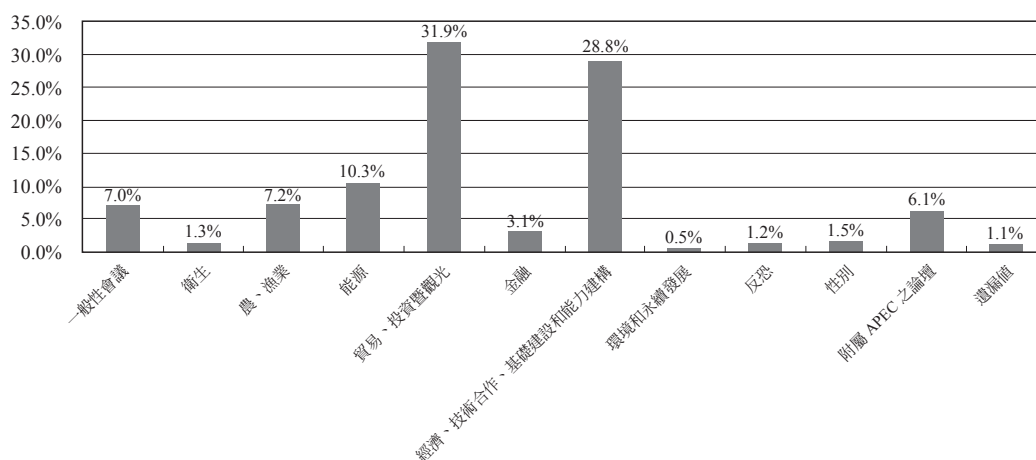
綜合以上對 APEC 組織運作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歸納下列幾項結論。第一，APEC 組織運作採論壇形式，會員體以共識決形成共同目標，但對於共同目標如何達成則任由會員體依本身的條件，自願性的，非拘束性的，漸進式的去實行。APEC 及會員體並無法律強制力去要求其他會員體履行承諾。第二，APEC 組織運作雖受共識決和自願性的論壇形式所限，但它仍然持有國際建制的某些特徵。例如重複賽局互動、建立聲譽、互利互惠、尋求議題結盟、知識及認知擴散、社會化等建制誘因，皆在某種程度上制約 APEC 會員體之行爲，協調彼此互動、重新界定會員體自身利益，進而願意採取合作態度，推動共同目標。第三，APEC 的正式組織相當精簡，其運作是由領袖會議，部長層級會議，資深官員會議，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計畫所串連組成。輪值主席國負責年度會議的召開事宜，並設定相關議程。秘書處則僅負責行政支援。資深官員會議是樞紐，承上啓下，準備 APEC 部長層級會議和領袖會議之議程，也銜 APEC 領袖及部長之命協調指揮其下設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執行 APEC 計畫。因此，欲了解整個 APEC 組織運作的過程，我們必須全面檢視 APEC 領袖會議，資深官員會議，及 APEC 工作計畫的成果。此項分析下節呈現。

肆、BFTAs 洽簽活動對 APEC 組織運作的 可能影響：假設的初步檢驗

首先，筆者檢視 APEC 公布的組織與活動。從其公開的組織架構圖觀之，APEC 的正式組織具有相當程度的功能分化。APEC 設有領袖會議、部長級會議、16 個產業部門的部長層級會議、資深官員會議（SOM）、貿易投資委員會（CTI）、預算及管理委員會（BMC）、經濟及技術合作次委員會（SCE）、經濟委員會（EC）、SOM 之特別任務小組、11 個工作小組、12 個隸屬 CTI 項下之工作小組、1 個隸屬 EC 項下之工作小組（競爭政策與法律小組，CPLG），及 3 個附屬於 APEC 的團體等（APEC，2010b）。其年度活動及會議（APEC，2010c）在 2000 年共有 162 個，2001 年共 123 個，2002

年共 147 個，2003 年共 155 個，2004 年共 172 個，2005 年共 195 個，2006 年共 190 個，2007 年共 197 個，及 2008 年也排列 223 個年度活動及會議。筆者針對 1995 年至 2008 年所有公開的 APEC 活動進行議題分類（以贊助單位為基準），結果呈現於表 2。

表 2：APEC 公開活動以議題分類，1995-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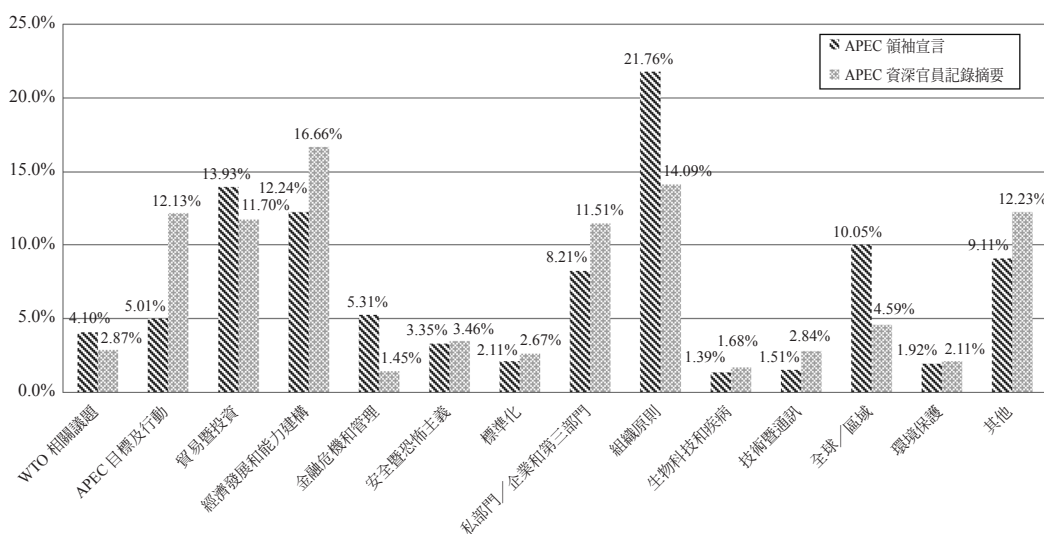
從表 2 我們知道與貿易、投資、及觀光議題相關的活動佔所有 APEC 活動的 31.9%；基礎建設、能力建構和經濟暨技術合作相關的活動則佔所有 APEC 活動的 28.8%。換言之，APEC 活動仍聚焦在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和經濟技術合作暨能力建構兩大主軸。此外，有 7% 的 APEC 活動是一般慣常舉行的會議，如 SOM、部長級會議、專業部長會議，及領袖會議等列在 APEC 公開行事曆上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附屬於 APEC 之論壇，如 ABAC, PBEC, PAFTAD, PECC, PRF 等活動也佔 APEC 所有活動的 6.1%。至於晚近較熱門的議題，如反恐、衛生、金融和環境等議題相關活動仍佔 APEC 所有活動的極小比例。整體觀之，這意謂著 APEC 活動仍緊扣其創立宗旨，即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發展來規劃進行，並非漫無目標地運作。

接著我們針對 APEC 領袖宣言和資深官員記錄進行內容分析。首先，根據 Dupont 和 Huang (2008) 的研究設計，將所有領袖宣言及資深官員會議記錄文本進行深入閱讀，由該兩作者經討論後辨識 99 個關鍵字串。這些關鍵字串包括動詞和名詞，且與 APEC 組織發展息息相關。再透過統計軟體 MAXQ

的操作，從文本辨識這 99 個關鍵字串個別所出現之頻率。最後才依字串性質合併歸類成 14 個大項議題。為求操作縝密，該研究流程亦經兩位研究生重新操作比對結果。有關本項內容分析之效度和信度，及 99 個關鍵字串細節，請參考 Dupont 和 Huang (2008)。在此筆者僅強調這項內容分析結果其實與學界對 APEC 發展史的質性敘述大致吻合，故初步斷定其具有外部效度。從以下各節的文本分析結果，讀者亦可判斷是否整體而言作者的文本內容分析結果符合其所認知的 APEC 歷史演進。⁶

如表 3 所示，自 1993 年到 2008 年 APEC 領袖宣言的內容以強調組織原則的比例最高佔 21.76%，如果再加上領袖提及 APEC 之目標行動（5%），或全球與區域（10%）等字串的比例，則我們知道 APEC 領袖宣言用了三分之

表 3：APEC 領袖宣言與資深官員紀錄摘要以議題分類，1993-2008



6 不過，筆者仍需提醒讀者有關文本內容分析的限制。尤其是 APEC 領袖會議及資深官員會議之政治意味濃厚。參與會議者本身或對其他成員表示敬意，或為表示對 APEC 論壇之認同，皆可能一再發表 APEC 與宗旨目標及發展主軸相符之「場面話」，以尋求共識。質是之故，本文之內容分析是否反映會員體之「肺腑之言」則有爭論。不過，學界慣用的文本內容分析法皆假設文本展現作者的意圖，長期追蹤文本與行動之變化，仍可辨別其意圖真偽。例如：本文除觀察 APEC 領袖宣言及 SOM 記錄中對其兩大核心議程的言辭重視，更檢視是否 APEC 領袖及 SOM 願意運用資源去執行與兩大核心議程相關之工作計畫。若兩相吻合，則我們較能斷定 APEC 領袖及官員於文本「提及」兩大核心議程可以代表其「重視」該議程。以上特此提醒讀者內容分析法之慣用假設及可能限制。

一以上的篇幅在重申強化其組織目標、原則及願景，並將 APEC 置於區域和全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攸關 APEC 組織的象徵性和原則性的領袖宣言內容，一方面顯示 APEC 會員體堅持其既有的組織發展原則，但另一方面也證實過去學界質疑 APEC 領袖會議往往華而不實，以模糊的原則代替具體的行動方案。儘管如此，從表 3 我們知道 APEC 領袖宣言仍扣緊其組織發展的兩大主軸，即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APEC 領袖宣言提及貿易和投資的比例佔 13.93%；提及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的比例則佔 12.24%。遠高出其他議題類別之比例（除組織發展原則之字串比例外）。這意謂著 APEC 領袖宣言所強調的重點大致與其組織發展宗旨相符，並非漫無章法地轉移焦點。

不但 APEC 領袖宣言強調的重點與 APEC 組織發展宗旨相符，就連其資深官員會議（SOM）記錄摘要亦呈現相似的分佈型態。如表 3 所示，APEC 資深官員強調 APEC 目標行動（12.13%）、組織原則（14.09%），和全球／區域（4.59%）等字串的比例約占其文本所有關鍵字串總數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貿易和投資（11.7%），以及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16.66%）等 APEC 發展兩大主軸被強調的比例仍是最高。有趣的是，在這 APEC 組織發展兩大主軸上，資深官員比 APEC 領袖更強調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不過兩者差異不大。由於 APEC 資深官員會議一方面準備和討論 APEC 領袖會議籌辦事宜，另一方面亦承襲 APEC 領袖宣言意旨，強化 APEC 年度活動發展重點。所以，反應在 APEC 領袖宣言和 SOM 記錄的關鍵字串比例上，兩者呈現非常相似分佈型態。的確，領袖宣言與資深官員會議記錄之關鍵字串比例的相關係數竟高達 0.785，且達統計顯著性（2-tailed, $p < .001$ ）。⁷ 這也意謂著 APEC 組織運作有其一貫的邏輯可循。APEC 資深官員會議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呼應 APEC 領袖宣言的意旨。

爲了更進一步瞭解 APEC 組織運作，我們分析 APEC 自 1993 年至 2008 年所執行的工作計畫。從過去 APEC 文獻中我們知道 APEC 工作計畫乃爲了達成 APEC 領袖及 SOM 所設定的目標來執行的。因此，如果 APEC 計畫的

7 若將本文關鍵字串的動詞納入相關分析，則相關係數更高，達 0.832，亦達統計顯著性（2-tailed, $p < .001$ ）。

議題分類分佈呈現與 APEC 領袖和 SOM 所強調的重點相符，則我們可以確認 APEC 組織運作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如表 4 所示，在 APEC 所執行的工作計畫中有 32.4% 是屬於貿易、投資和觀光類，39.6% 是屬於經濟和技術合作暨能力建構類。換句話說，APEC 組織發展的兩大核心主軸亦呈現於其工作計畫的議題分佈中。整體來看，雖然 APEC 兩大主軸的工作計畫比例較 APEC 領袖宣言和 SOM 會議紀錄所強調重點之字串比例還高出甚多，但這是因為後兩者關鍵字串比例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闡述或重申 APEC 組織運作宗旨、原則和目標等象徵性意見，故其強調貿易投資，以及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兩大主軸的關鍵字串比例相對較小。不過從 APEC 工作計畫的議題分佈比例來看，我們大致可以證實它與 APEC 組織運作的宗旨相符。

爲了進一步瞭解 BFTAs 如何影響 APEC 組織運作，我們分析 APEC 領袖宣言及 SOM 記錄中強調其組織發展之兩大主軸的變動情形。如果 APEC 會員體忙於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無心參與 APEC 相關活動，則我們預期會員體領袖及資深官員強調貿易投資的關鍵字串比例應會降低（簡稱「危害說」）。如果 APEC 組織運作與會員體洽簽 BFTAs 是相輔相成，則我們預期 APEC 領袖宣言及 SOM 記錄強調貿易投資的比例會至少維持現有水準，甚或上升（簡稱「相容說」）。如表 5 所示，APEC 領袖宣言強調貿易暨投資的關鍵字串比例似乎是逐波下滑。第一波高點出現於 1994 年，APEC 領袖強調貿易暨投資之字串比例爲 42.9%。然後逐步下滑，直到第二波高點出現於

表 4：APEC 工作計畫以議題分類，1993-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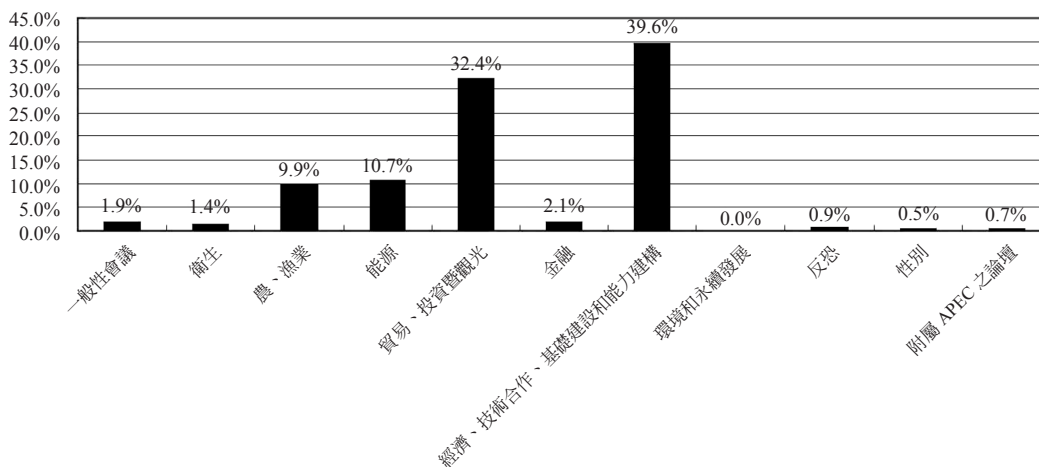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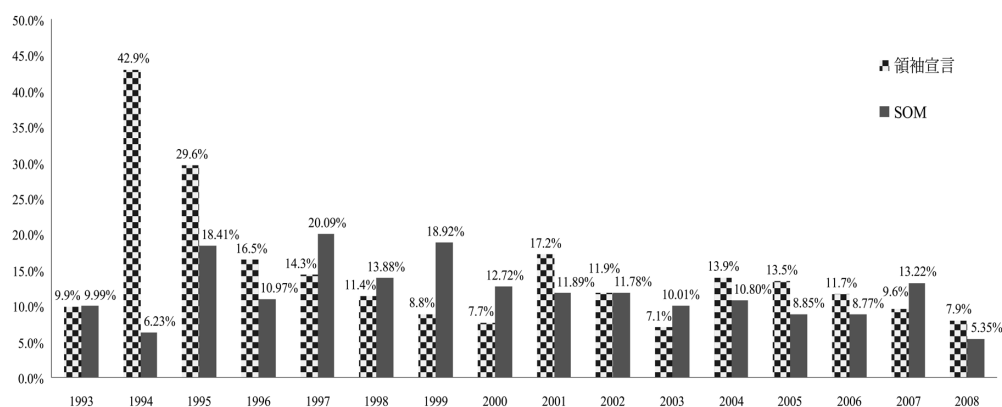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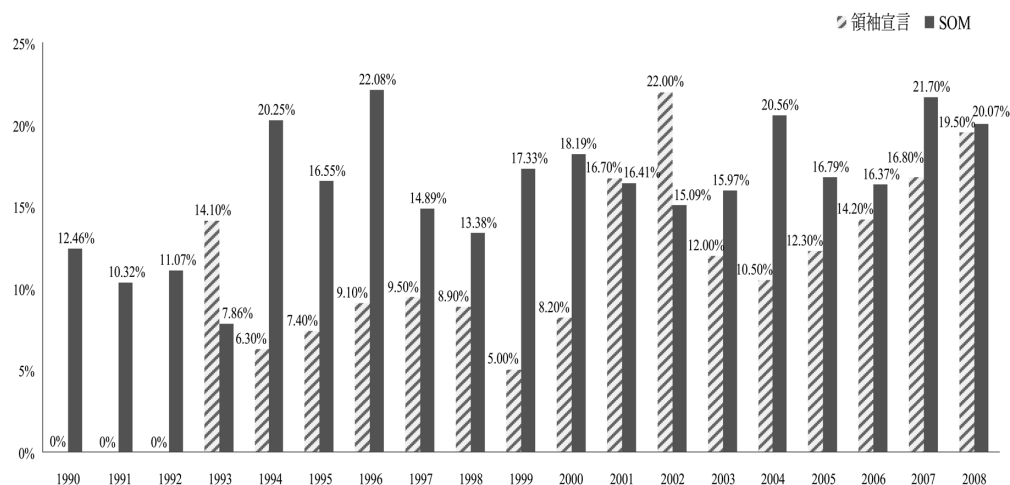
表 5：貿易與投資以年份分類，1993-2008



2001年，達17.2%；然後強調比例再次下降至2003年的7.1%。第三波高點雖出於2004年，達13.9%，然後再下滑至2008年的7.9%。從過去文獻我們知道APEC會員體開始積極洽簽BFTAs是發生在1999年之後。因此表7所呈現的並不全然符合「危害說」。雖然領袖宣言強調貿易投資之字串比例逐漸下降，但其下降時點早於1999年，而且其被領袖所強調之比例在1999年之後仍有起伏，非持續下滑。故從表7很難斷定是否因為BFTAs的洽簽活動而轉移APEC領袖之焦點。

若進一步觀察SOM記錄中有關貿易和投資的關鍵字串比例分佈（如表5所示），我們發現自1999年後，資深官員強調貿易投資的比例有些微下滑的趨勢。除了2007年該項比例有些反彈外（達13.22%），比較1999年之前APEC資深官員自1999年後似乎較不重視貿易與投資。雖然這下滑趨勢似乎與「危害說」之假設相符，但是我們仍不能據此證實這是因為APEC會員體忙於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引起的。也許SOM較少強調貿易投資可能與其他未知的干擾因素有關。如表6所示，SOM記錄中強調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之關鍵字串比例自1999年後一直維持在15%到22%左右。與1999年之前相比，該類比例在1999年之後從未低於15%，因此其基線似乎有墊高趨勢。這種趨勢展現於領袖宣言中更加明顯。從表6我們發現1999年之後APEC領袖強調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的關鍵字串比例，整體而言明顯高於1999年前該類字串比例。換句話說，在各年度領袖宣言及SOM記構之計畫比例卻

表 6：經濟發展暨能力建構以年份分類



錄摘要文本篇幅大致相同情況下，1999 年之後 APEC 領袖與資深官員的確較重視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不過，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在 1999 年之後較少強調貿易投資自由化，與較常強調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之間並無統計相關性。⁸ 換言之，兩者並非互斥關係。

截至目前，雖然 APEC 領袖與 SOM 自 1999 年後較少強調貿易投資似乎與「危害說」相符，但兩者自 1999 年後卻又較常強調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似乎指向「相容說」。其實 APEC 的開發中會員體經常指出經濟發展及能力建構為其貿易自由化和開放內部市場之奠定基礎，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洽簽活動似乎使得 APEC 領袖及 SOM 更加重視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不過除了領袖和資深官員的重視外，我們也應觀察 APEC 在實際執行的工作計畫中是否也反映其組織發展主軸偏好的轉變。如表 7 所示，平均來看 1999 年之後 APEC 所執行貿易和投資（含觀光）相關的工作計畫比例明顯高於 1999 年之前的比例。⁹ 儘管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自 1999 年之後便較少強調貿易投資主軸，但 APEC 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所執行的貿易和投資相關計畫比例仍逐漸增加。另一方面，攸關經濟技術合作以及基礎建設暨能力建相對減少。如

8 在領袖宣言部分，強調貿易投資與經濟發展的相關係數是 -0.388 (2-tailed, $p < .137$)；在資深官員會議紀錄摘要部分，兩者相關係數為 -0.191 (2-tailed, $p < .479$)。

9 觀光類計畫涉及人員跨國界消費，被列入 CTI 委員會的工作計畫。本文以 APEC 分類為之。

表 7：APEC 工作計畫表以年度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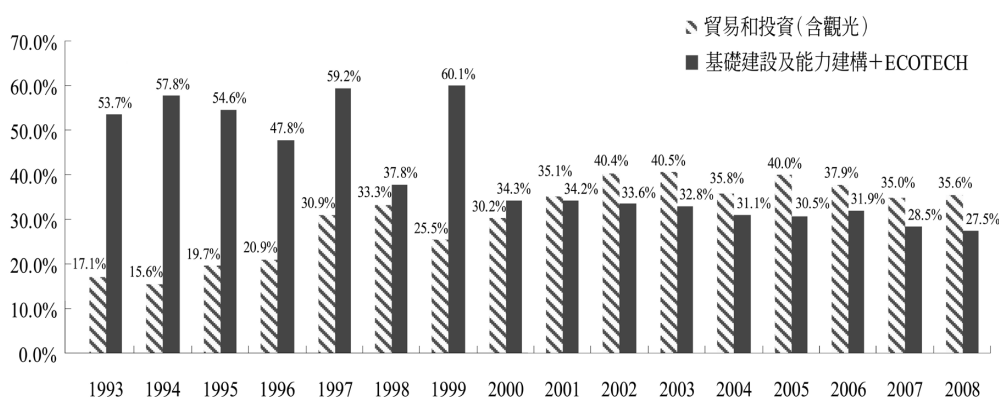


表 7 所示，在 1999 年之前攸關 APEC 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的工作計畫比例占所有計畫比例一半以上，但 1999 年之後該比例降至三分之一左右。這個下降趨勢與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在 1999 年之後所強調的發展重點似乎相反。儘管自 1999 年後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皆較強調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但攸關貿易投資之工作計畫比例則呈現上升趨勢，使得其所占比例約與經濟發展暨能力建構之工作計畫比例相當（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原因何在？

筆者推測，1995 年日本在大阪 APEC 領袖會議中提議捐助之「貿易投資自由化暨便捷化的專屬基金」（TILF Special Fund）可能使得 APEC 工作計畫中之貿易投資類比例相對提升。從 APEC 工作計畫資料庫，我們知道 1997 年才開始記載 TILF 專屬基金工作計畫之執行狀況。如表 8 所示，自 1997 年以後在 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所執行的工作計畫中，越來越多工作計畫是由 TILF 專屬基金資助。相對地，由 APEC「操作基金」（Operation Fund）所資助的 CTI 工作計畫卻越來越少。因此，1999 年之後攸關貿易投資之 APEC 工作計畫比例上升應與 TILF 專屬基金的資助有關。的確，若我們將 TILF 專屬基金所資助之 CTI 計畫去除，則可發現其實 APEC 在經濟發展及能力建構類別所做的工作計畫比例遠高於 CTI 計畫比例。而且如表 9 所示，自 1999 年以後 APEC「操作基金」在貿易投資，以及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兩大主軸所執行之工作計畫比例皆呈現下滑的趨勢，且兩者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相關係數為 0.702；2-tailed, $p < 0.002$ ）。

表 8：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之工作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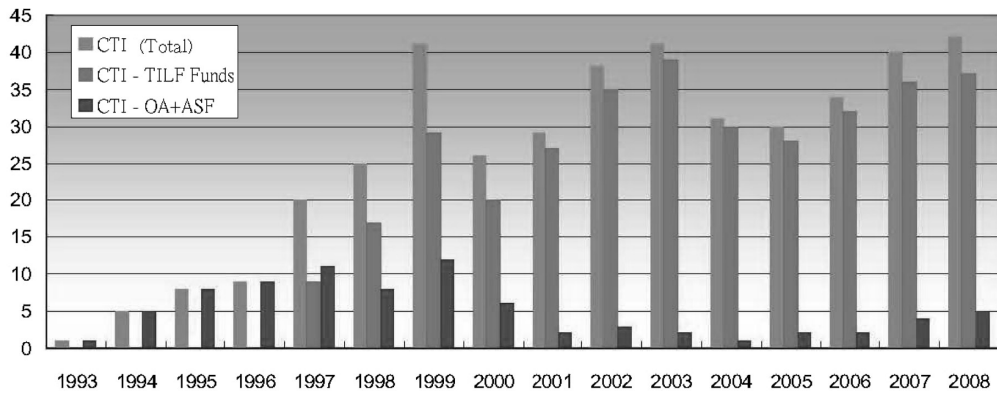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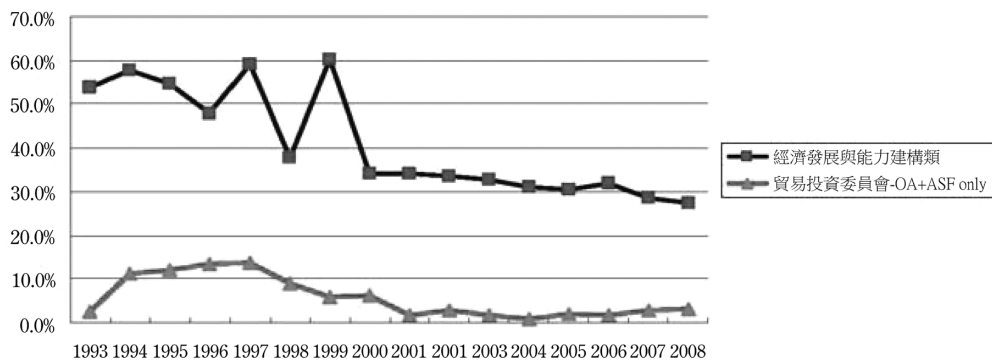


表 9：APEC 工作計畫

——貿易投資委員會類（no TILF Fund）vs. 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



這意謂著，如果不計 TILF 專屬基金，自 1999 年以後 APEC 工作計畫的執行狀況似乎與「危害說」相符。

伍、檢證 BFTAs 對 APEC 組織運作的衝擊之假設

綜合上節對 APEC 組織運作現狀之討論，我們發現不論是在 APEC 領袖宣言或在資深官員會議紀錄上，與 1999 年之前相比，APEC 領袖暨資深官員在 1999 年之後強調其投資與貿易發展主軸關鍵字串之比例是較低的。反觀，APEC 領袖暨資深官員在 1999 年之後強調經濟發展與能力建構主軸的關鍵字

串比例反而較 1999 年之前為高。不過，若不計 TILF 專屬基金項下之工作計畫，我們發現自 1999 年以後 APEC 執行的貿易投資類，以及經濟發展暨能力建構類的工作計畫比例，皆比其 1999 年之前所執行的同類工作計畫比例降低許多。由於，1999 年之後 APEC 會員國轉而積極洽簽 BFTAs，故這些 BFTAs 洽簽活動「似乎」轉移了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對其兩大發展主軸之關注，也「似乎」危害 APEC 會員體針對其兩大發展主軸的工作計畫之執行。是否因 APEC 會員體忙於 BFTAs 洽簽活動使其領袖和資深官員不再重視 APEC 之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之發展主軸呢？是否因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活動而使得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轉而重視經濟技術合作暨能力建構的發展主軸呢？又是否因 BFTAs 之洽簽活動使得 APEC 會員體疏於執行其兩大主軸的工作計畫呢？

就時序來看，我們可以假定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因其個別 BFTAs 之洽簽活動而較少關注 APEC 貿易和投資議程，同時卻轉而投入較多關注於經濟發展及能力建構主軸上。但在經驗證據上我們仍無法確切否認上述假設。原因是 APEC 領袖宣言及資深官員會議紀錄是 APEC 會員體共識所展現的一致立場，而 BFTAs 之洽簽是兩兩會員體，或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之間的互動。因此，在檢證 BFTAs 與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的關注重點的相關性時，我們的分析單位是當年度 APEC 會員體所洽簽的 BFTAs 總數，與當年度 APEC 領袖與資深官員強調兩大主軸之比例。由於觀察案例有限 (N=18)，且未能控制其他相關變數，故以下發現仍屬初探性質，有待進一步釐清。

首先，在二元迴歸分析不控制其他相關變數情況下，我們發現當年度 APEC 所有會員體向 WTO 登記的 BFTAs 數目越多，則 APEC 領袖宣言 (LD) 和資深官員會議記錄摘要 (SOM) 提及貿易與投資類之關鍵字串比例越小 ($LD-\beta = -.593$; $p < .094$; $SOM-\beta = -.335$, $p < .019$)。反觀，當年度會員體 BFTAs 總數越多，則 LD 和 SOM 提及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類的關鍵字串比例越大 ($LD-\beta = .334$, $p < .068$; $SOM-\beta = .261$, $p < .07$)。換言之，APEC 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活動使得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較少關注 APEC 的貿易和投資類 (TI) 議程，反而較重視其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類 (EC) 議程。此外，我們發現截至當年度 APEC 所有會員體向 WTO 登記的 BFTAs 累計數目越

多，則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提及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類的關鍵字串比例越高 ($LD-\beta=.08, p<.018$; $SOM-\beta=.064, p<.014$)，但對其是否重視貿易投資類議程則未達統計顯著性。

由於上述分析樣本總數僅 18 個，故因自由度不足無法控制其他相關變數。不過，為求嚴謹筆者特別控制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提及反恐安全的字串比例。原因是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一般認為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已轉移注意力至反恐安全議題。而從時序來看，反恐安全議題在 APEC 受到關注，恰巧與其會員體轉而積極洽簽 BFTAs 時點相吻合。因此若控制 APEC 對反恐安全的重視後，我們仍能發現 BFTAs 數目會影響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關注 APEC 兩大核心議程（即 TI 和 EC）的關鍵字串比例時，則我們對 BFTAs 洽簽活動的真正影響力會較有信心。我們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控制反恐安全字串比例後，當年度 APEC 所有會員體向 WTO 登記 BFTAs 數目對當年度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關注 TI 和 EC 字串比例的顯著影響力消失。唯一例外是截至當年度 APEC 向 WTO 登記 BFTAs 的累計數目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提及 EC 字串比例仍具正向顯著性顯著相關性 ($LD-\beta=.072, p<.077$; $SOM-\beta=.124, p<.027$)。換言之，隨著 APEC 會員體洽簽 BFTAs 的累計數目增加會促使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更重視其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類議程。

上述發現與學界前輩籠統地陳述 APEC 會員體忙於洽簽 BFTAs 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的負面衝擊假設不同。我們無法證實當年度 APEC 會員體簽署 BFTAs 數目對其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貿易投資類議程是否有關。但其簽署 BFTAs 的累計數目卻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是否強調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構類議程有正向且顯著影響力。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對 APEC 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成長及能力建構為其首要目標。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雖為已開發 APEC 會員體的關注議程。但為了滿足發展中 APEC 會員體需求，使其答應推動 APEC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議程，則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 EC 議程常被視為一種「額外給付」(side payment)。隨著 APEC 會員體 BFTAs 累計數目越多，意謂著其貿易投資自由化議程（透過 APEC 以外途徑）已有所進展，於是進一步要求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更重視 EC 議程。所以 BFTAs 累計數

目會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 EC 關鍵字串比例有正向顯著效果。另一種解釋是 BFTAs 談判前提涉及兩談判方的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必須兩國之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提升至能夠支援 BFTAs 談判才有辦法洽簽 BFTAs。換言之，APEC 經濟技術合作及能力建構議程實乃促使會員體洽簽 BFTAs 之前提要件。於是隨著 APEC 會員體 BFTAs 累計數目越多，使得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越重視並強調 EC 議程。當然，隨著 APEC 會員體簽署 BFTAs 累計數目越多，也可能促使其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貿易投資類議程的邊際效用遞減，故較不重視貿易投資類議程。但我們目前的資料分析並無法證實上述假設。我們發現當年度 BFTAs 數目和累計數目，在控制反恐安全字串比例後，並未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貿易和投資類議程產生任何顯著影響力。

接著我們分析兩兩 APEC 會員體所簽署的 BFTAs 數目是否對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有何影響。不同於上述針對 APEC 領袖宣言和資深官員會議記錄的分析，此部份所使用的資料是 APEC 會員體及其洽簽 FTA 對象之兩兩配對 (dyad) 的時間序列資料。筆者以 APEC 的 21 個會員體為分析主體，納入自 1990 年到 2008 年各年度個別 APEC 會員體與其 BFTAs 簽署對象 (可能是另一 APEC 會員體或另一非 APEC 會員國) 的兩兩配對資料，共取得 24225 個樣本點。這為數龐大的資料樣本使我們能夠控制許多不同性質的相關變數，例如：文本所控制的兩兩配對國之貿易依存度 (以貿易占其 GDP 比例為操作指標)，兩國的政治關係親疏 (以是否互設大使館為操作指標)，及時間傀儡變數等。筆者分別以兩兩配對國當年度執行 APEC 的貿易投資委員會 (CTI) 項下的工作計畫數目，和執行其經濟技術合作委員和能力建構類 (EC) 的工作計畫數目為依變數。以當年度兩兩配對國是否向 WTO 登記 BFTAs，及當年度兩配對國所登記的 BFTAs 之累計數目加總為主要解釋變項，並控制上列相關因素，所得三項迴歸方程式如下：

$$(1) \text{CTI_UN} = a + b_1 \text{FTA} + b_2 \text{Accu FTAs} + b_3 \text{Embassy} + b_4 \text{Sum XM GDP} + b_5 \text{APEC} \\ + b_6 \text{SD 0308} + e$$

$$(2) \text{EC_UN} = a + b_1 \text{FTA} + b_2 \text{Accu FTAs} + b_3 \text{Embassy} + b_4 \text{Sum XM GDP} + b_5 \text{APEC} \\ + b_6 \text{SD 0308} + e$$

$$(3) TP_UN = a + b_1 FTA + b_2 \text{Accu FTAs} + b_3 \text{Embassy} + b_4 \text{Sum XM GDP} + b_5 \text{APEC} \\ + b_6 \text{SD 0308} + e$$

a=常數；bi=係數；e=誤差項

CTI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CTI 計畫之總數

EC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EC 計畫之總數

TP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CTI 和 EC 計畫的聯集數目

FTA=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向 WTO 登記之 BFTAs

Accu FTAs=截至當年度兩配對國向 WTO 登記之 BFTAs 數目累計加總

Embassy=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互設大使館

Sum XM GDP=當年度兩配對國之貿易占其 GDP 比例加總

APEC=當年度兩配對國之一是否為 APEC 會員國

SD 0308=2003—2008 年時間傀儡變數

在理論上如果「危害說」成立，則我們預期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向 WTO 登記 BFTAs 會對兩配對國執行 APEC 之 CTI 計畫數目、EC 計畫數目，和 CTI + EC 計畫數目有負向的顯著影響力。然而，隨著 BFTAs 累計數目的增加，我們預期兩配對國會更有意願去執行 APEC 的 CTI 和 EC 之工作計畫，因為 APEC 工作計畫在本質上可以假設與 BFTAs 洽簽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其次，我們預期兩配對國政治關係越佳，越有可能執行 APEC 工作計畫。另外，我們也控制兩配對國各自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影響力。原因是兩配對國之個別對外貿易占其 GDP 比例的加總越高，越顯示其重視對外貿易和彼此經貿關係，故也較有意願執行有利於貿易推展的 APEC 之 CTI 和 EC 工作計畫。當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的前提是兩配對國之一是否為 APEC 會員體。因此，我們控制兩配對國之一若是 APEC 會員體，則我們預期兩配對國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會較多。最後我們必須控制時間變數，因為在我們資料中，從 2003 年到 2008 年是 APEC 會員國簽署較多 BFTAs 的時期。為了避免兩配對國洽簽 BFTAs 集中於特定時期所造成偏差，我們必須控制這區間變數。為求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筆者於表 10 呈現大家較熟悉的 OLS 的迴歸模型之分析結果。

表 10：BFTAs 對 APEC 執行核心工作計畫之衝擊—OLS 迴歸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EC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EC 計畫數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Constant	-1.310***	.054	-1.388***	.065	-2.698***	.113
FTA	-1.307***	.292	-1.712***	.354	-3.019***	.620
Accu FTAs	.109***	.004	.107***	.005	.216***	.008
SD0308	5.556***	.468	7.544***	.567	13.100***	.992
Embassy	1.635***	.047	2.152***	.056	3.788***	.099
SumXMGDP	.003***	.000	.003***	.000	.005***	.000
APEC	1.200***	.046	1.718***	.056	2.919***	.097
	F=613.12***		F=684.94***		F=706.83***	
	R ² =.132		R ² =.145		R ² =.149	
	N=24225		N=24225		N=24225	

Note:*** → p<0.001

就模型的選擇而言，本研究的資料因為是兩兩配對國之時間序列形式，故必須將時間因素同時列入考慮，觀察自變數是否會隨時間而去影響依變數。經 Hausman 檢定，我們發現固定效果模型表現較佳，因此於表 11 呈現「固定效果」(fixed-effect) 模型。如表 11 所示，在 24225 個樣本點中，包含了 1275 個國家配對組別，每一組皆有 1990 年至 2008 年共 19 個年份資料。其中，除了互設大使館變項因不受時間演變影響而被「固定效果」模型剔除外(組間標準差為零)，其餘變項的方向和統計顯著性皆與表 10 相同。因此，本文僅報告表 10 之分析結果。又為測試表 10 的發現是否在統計模型上是穩定且完備(robust)的，筆者於附錄二放上「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 模型，Hausman 檢定，以及「OLS 穩健迴歸」(robust regression) 模型的分析結果。我們亦發現穩健迴歸模型結果與表 10 雷同。因此，我們對表 10 的分析結果也更具信心。

表 11：BFTAs 對 APEC 執行核心工作計畫之衝擊—固定效果模型分析結果

變數 名稱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EC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EC 計畫數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Constant	-.804***	.072	-.649***	.082	-1.453***	.145
FTA	-1.112***	.245	-1.860***	.277	-2.972***	.491
Accu FTAs	.218***	.005	.230***	.005	.448***	.009
SD0308	3.163***	.394	4.981***	.445	8.144***	.789
Embassy	dropped	—	dropped	—	dropped	—
SumXMGDP	.004***	.000	.004***	.000	.007***	.000
APEC	.176***	.092	.512***	.104	.688***	.184
	F=611.85***		F=563.63***		F=661.76***	
	R ² : within=.118		R ² : within=.109		R ² : within=.126	
	國家配對組數：1275 組 年變數：1990~2008， 共 19 年		國家配對組數：1275 組 年變數：1990~2008， 共 19 年		國家配對組數：1275 組 年變數：1990~2008， 共 19 年	

Note:*** → p<0.001

Variable		Mean	Std. Dev.	Min	Max	Observations
Embassy	overall	.3654902	.4815773	0	1	N=24225
	between		.4817563	0	1	n=1275
	within		0	.3654902	.3654902	T=19

從表 10 我們發現不論依變數是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CTI 或 EC 工作計畫數目，或執行 CTI 與 EC 工作計畫數目的加總，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向 WTO 登記 BFTAs 對於依變數皆具負向且顯著的衝擊。這意謂著當兩配對國在特定年度若必須處理 BFTAs 事宜，則兩配對國在該年度所執行的 APEC 工作計畫（不論是 CTI、EC 或 CTI+EC 計畫）數目越少。據此，我們可以初步證實「危

害說」，即 APEC 會員體間或與非會員國之 BFTAs 洽簽活動是會危害 APEC 核心工作計畫之執行。不過一個更有趣的發現是截至當年度兩配對國向 WTO 登記的 BFTAs 累計總數對兩配對國執行 APEC 工作計畫之數目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力。換言之，在特定年度一旦兩配對國所累積的 BFTAs 數目越多，則兩配對國在該年度執行 APEC 工作計畫的數目越多。因為 APEC 的 CTI 和 EC 工作計畫不但與 BFTAs 所引領的貿易自由化有關，而且像 EC 計畫涉及 APEC 會員體經濟發展和能力建構，常被視為其發展中會員體洽簽 BFTAs 之前提要件。所以，一旦兩配對國 BFTAs 累計數量越多，則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的意願便越高，反映在實際執行 APEC 工作計畫之數目上也自然越多。可是若當年度兩配對國必須處理 BFTAs 事宜越多，這可能代表該兩配對國原本用在執行 APEC 工作計畫之行政人力資源已轉移至 BFTAs 洽簽或執行上，於是造成當年度兩配對國所執行的 APEC 工作計畫數目減少。以上本文的發現乃學界前輩所未察覺。它一方面證實學界較籠統的假設，即 BFTAs 洽簽活動對 APEC 核心工作計畫造成的負面衝擊。但另一方面，筆者發現隨著 BFTAs 之累積數目增加，反而會促使兩配對國更有意願執行 APEC 的 CTI 和 EC 核心工作計畫，因而 APEC 核心工作計畫數目也是增加的。

除上述主要發現外，表 10 控制了其他相關變數。如表 10 所示，當年度兩配對國的政治關係及貿易依存度對該配對國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皆具正向且顯著影響力。如同文本稍前的理論預期，若當年度兩配對國彼此互設有大使館，則兩國所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是較多的。同時若當年度兩配對國各自對外貿易占其 GDP 比例越高，則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也越多。當然，是否執行 APEC 工作計畫的前提是兩配對國之一必須是 APEC 會員體。因此，我們控制的 APEC 會籍傀儡變數亦呈現正向且顯著影響力。以上控制變數的影響力完全符合文本稍前的理論預期，而且整體模型亦達統計顯著性。因此，我們對於主要解釋變數（即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向 WTO 登記 BFTAs 和其累積數目）的顯著影響力有較大的信心。

從檢證理論假設的角度觀之，學界對 BFTAs 與多邊經貿組織之關係向來即有「相容說」和「危害說」之爭論。相容說實源自 2000 年以來 APEC 對外宣稱 BFTAs 符合其組織的宗旨目標。即藉由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促進區域貿

易整合，而達到全球貿易自由化之目標。同時 APEC 亦頒布綱領，使得會員體洽簽 BFTAs 時有所依循，不致違背 APEC 之「開放性區域主義」之精神。不過危害說則認為，若從會員體洽簽之 BFTAs 內容觀之，它們實與 APEC 之開放性和非歧視性原則相違。又因 BFTAs 洽簽活動繁瑣複雜，故往往使得會員體技術官僚不勝負荷，無法全力投入 APEC 相關活動。於是 BFTAs 可能竊占 APEC 的核心議程，危害其組織運作。上述兩說其實皆有道理，然而卻僅止於假設推論而已。學界前輩並未進一步舉證說明 BFTAs 如何影響 APEC 組織運作。

本節使用為數龐大的 APEC 計畫書文本並依時序採用兩兩配對國 (dyad) 資料型態，也控制相關變數。根據本節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若當年度兩配對國有向 WTO 登記 BFTAs，則會對依變數產生負面且顯著的影響力。這項發現證實了「危害說」，即 BFTAs 之洽簽活動的確會削減會員體執行 APEC 計畫之數目，故弱化其組織運作。可是更有趣的發現是截至當年若兩配對國向 WTO 登記的 BFTAs 累計數目越多，則兩配對國在該年度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越多。這可能是因為 APEC 的工作計畫常被視為會員體洽簽 BFTAs 之能力建構或額外補償。所以，一旦兩配對國 BFTAs 累計數量越多，則其執行 APEC 計畫的需求和意願也越高，故實際執行 APEC 工作計畫之數目也越多。此項發現似乎又與「相容說」相符。綜合本節實證分析結果，筆者試著修正既有的理論假設。筆者認為修正後的假設命題應是如下：「在特定時點 APEC 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活動會危害 APEC 組織運作；但其 BFTAs 之累積數目卻會強化既有的 APEC 組織運作。」此項修正後的假設是否能延伸適用至其他多邊經貿組織仍有待相關經驗資料檢證，但筆者希望此項假設的修正能有助於我們更瞭解 APEC 組織運作。

陸、結論

本文試圖釐清 1990 年代後期亞太地區盛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活動是否及如何衝擊亞太經合會的組織運作。APEC 做為一個弱勢的國際建制，採用共識決，自願性和非拘束性的運作方式，一般預料不會對貿易自由

化產生任何實質的影響。正因為 APEC 的茂物目標遲未獲進展，「早期自願產業別自由化」政策亦宣告失敗，使得部分 APEC 會員體積極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尋求市場開放，排除貿易及投資障礙。這股 BFTAs 洽簽風潮自 1999 年後便風起雲湧。從本文表 1，我們知道截至 2009 年 6 月，亞太國家（以 APEC 會員為主體）所提議，談判協商，或已簽署刻正執行的 BFTAs 數目共計 348 個。若僅計 APEC 會員體彼此所討論，談判和洽簽的 BFTAs 數目也有 45 個（截至 2009 年止，並不計 AFTA, NAFTA, 即 AUNZFTA 之內部協定數目）。當 APEC 會員體紛紛忙於洽簽 BFTAs 之際，到底 APEC 的組織運作是否受到影響呢？學界前輩往往認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不利於多邊組織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也以爲 BFTAs 洽簽活動通常會轉移原已稀有的行政資源，故不利於多邊經貿組織的運作。不過他們同時指出，上述假設僅是「印象式」的陳述，並無具體證據來證明 BFTAs 危害多邊經貿組織運作（Ravenhill, 2007）。爲彌補前人研究 APEC 組織運作時所遭遇的經驗資料不足的缺憾，本文搜集大量系統性的 APEC 原始檔案，並據此來評估 BFTAs 對多邊經貿組織運作的衝擊。

首先，從 APEC 領袖宣言和資深官員會議（SOM）記錄摘要文本的內容分析中，我們發現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自 1999 年後的确強調貿易投資之關鍵字串比例較 1999 年前爲低，這似乎與「危害說」相符。可是我們也發現 1999 年以後，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強調經濟和技術合作暨能力建構的關鍵字串比例的确較 1999 年之前的比例爲高，這發現又似乎與「相容說」符合。換言之，假若 APEC 會員體的 BFTAs 洽簽活動真會影響 APEC 核心議程的討論及重視，則 BFTAs 的影響力也非外界所普遍認知，即千篇一律的「危害說」。本文發現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若真受 BFTAs 洽簽活動所影響而改變其所強調的 APEC 核心議程重點，則他們會更重視經濟和技術合作暨能力建構之核心議程。其背後原因爲何，本文因篇幅所限無法細究。但筆者願提出幾項合理的假設。其一是 APEC 會員體若視 BFTAs 爲較有效的途徑去推動貿易自由化，則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也就沒有必要特別去強調 APEC 之貿易自由化和便捷化議程。其二是 ECOTECH 議程一向被 APEC 之開發中國家視爲其接受貿易自由化及市場開放之額外補償（side payment）。因此，當 BFTAs

有效推動貿易自由化議程時，則 APEC 領袖和 SOM 更須強調 ECOTECH 以尋求 APEC 開發中會員體支持。其三是 ECOTECH 的本質是促進會員體經濟發展及能力建構，也可能間接有助於貿易自由化及便捷化的推動。因此 APEC 領袖及 SOM 在 BFTAs 洽簽風潮下可能會更強調 ECOTECH 之核心議程，以收相輔相成之效。不過以上僅止於筆者之合理臆測，仍待另文加以檢證。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 APEC 領袖宣言及 SOM 會議記錄的分析中，並無法控制其他干擾因素。僅以 1999 年為分野，大略釐清 APEC 領袖及 SOM 所強調議程的趨勢。但這趨勢或與「危害說」和「相容說」相符，卻不能證明的確是因 BFTAs 洽簽活動所影響而導致 APEC 領袖和 SOM 強調重點有所改變。又本文的二元迴歸分析雖初步證實 APEC 會員體當年度洽簽 BFTAs 數目愈多，則其領袖強調貿易自由化和便捷化的關鍵字串比例愈低，反而強調經濟暨技術合作之關鍵字串比例愈高。但上述顯著影響力在控制反恐安全因素後便消失。僅 BFTAs 累計數目仍對 APEC 領袖和資深官員強調經濟暨技術合作議程具正向且顯著影響力。

上述資料處理上的限制在於 APEC 領袖宣言及 SOM 會議記錄的母體數目（以年份計）太小所限。16 筆領袖宣言及 59 筆 SOM 記錄常無法做任何有意義的統計控制。更何況兩項文本所呈現的皆是共識意見，故會員體觀點差異並不得而知，這使得許多與會員體相關的自變數（如是否彼此簽署 BFTAs？）和控制變數均無法列入。有鑑於此，本文分析 APEC 工作計畫時採用時間序列兩兩配對（dyad）資料型態，將樣本點擴充至 24225 個。這使得筆者可以在控制其他干擾因素下來探討 BFTAs 是否影響 APEC 工作計畫的執行。從第五節分析結果，我們發現不論依變數是 CTI 或 EC 項下計畫數目，或兩者的聯集，若特定年度任兩配對國有向 WTO 登記 BFTAs，則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數目越少。這項發現證實了學界的共識，即「危害說」。可是若特定年度任兩配對國所累積的 BFTAs 數目愈多，則其執行 APEC 工作計畫之數目愈多。此發現乃學界前輩尚未察覺，但卻與「相容說」符合。據此，本文修正了目前的理論共識。筆者試著以命題方式呈現修正後的假設：即「在特定時點 APEC 會員體之 BFTAs 洽簽活動會危害 APEC 組織運作；但其 BFTAs 之累積數目卻會強化既有的 APEC 組織運作。」此項修正後假設是

否能延伸適用到其他多邊經貿組織仍有待相關經驗資料檢證。不過，筆者希望本文的發現能有助於學界更瞭解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 APEC 組織運作之衝擊。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江啓臣

- 2007 〈亞太區域架構現況與 APEC〉，見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編），《2007 APEC 重要議題研究：APEC 領袖高峰會及第三屆東亞高峰會之探討》，頁 19-27。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吳玲君

- 1997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組織特性及展望〉，《東南亞季刊》2(1): 68-81。
1998 〈從東亞金融危機看亞太經合會建制的本質〉，《問題與研究》37(4): 1-78。

吳榮義

- 2008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我國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吳榮義演講（2008 年 10 月 31 日，黃國治紀錄），《APEC 通訊》110: 15-16。

李瓊莉、徐斯勤

- 2005 〈因應多面向區域挑戰的 APEC 制度發展：組織變革與行為模式〉，「世局變化下的 APEC 與我國參與」學術研討會，頁 48-73。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台大政治系。2005 年 10 月 14 日。

周子欽

- 2007 〈第三章 APEC 對 FTAAP 的評估〉，見江啓臣（主編），《2007 年 APEC 議題叢書》，頁 57-81。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洪德生、江啓臣

- 2006 〈進退兩難的 APEC 改革〉，《APEC 通訊》82: 2-3。

張亞中

- 1998 《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出版社。

詹滿容、江啓臣

- 2002 〈『APEC』與『WTO』國際建制之分析與比較〉，《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0: 11-22。

廖舜右

- 2003 〈『共同社群：我們的未來』APEC 改革之路〉，見江啓臣（主編），《2003 年 APEC 議題叢書》，頁 173-190。台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黃偉峰

- 2003 〈緒論〉，見黃偉峰（主編），《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頁 1-22。台北：五南出版社。
2005 〈開放性區域主義之封閉迴路：APEC 與 EFTA 的制度化之比較研究〉，中央研究

院亞太研究計畫第二年度執行報告。

B. 英文部分

Aggarwal, V. K. and Charles E. Morrison

1998 *Asia-Pacific Crossroads: Regime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PE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Aggarwal, V. K. and Kun Chin Lin

2001 "APEC as an Institution," pp. 177-190 in Richard E. Feinberg and Ye Zhao (eds.), *Assessing APEC's Progress: Trade, Ecotech and Institutions*. Singapore: ISEAS Press.

Aggarwal, V. K. and Shujiro Urata (eds.)

2005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

2010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aric.adb.org/>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1995 *Implementing the APEC Vision: Third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Singapore: APEC Secretariat.

2010a *How APEC Operates*.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apec.org/About_Us/how_APEC_Operates.aspx

2010b *APEC Structure*.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apec.org/About_Us/how_APEC_Operates/Structure.aspx

2010c *APEC Events Calendar*.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apec.org/Events-Calendar.aspx>

2010d *Leaders' Declaration of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Summit*.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aspx>

2010e *The APEC Project Database (AIMP)*.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aimp.apec.org/pdb/default.aspx>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

Baldwin, R. E.

1997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20(7): 865-888.

2008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pp. 51-86 in B. Eichengreen, C. Wyplosz, and Y. C. Park (eds.), *China, Asia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gsten, C. F.

1994 "Sunrise in Seatt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5(1): 18-20.

2000 "Back to the Future: APEC Looks at Sub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o Achieve Free Trade Goal," Speech Given at PBEC Luncheon, October 31. USA: Washington D.C.

Bhagwati, J.

1992 "The Threats to the World Trade System," *The World Economy* 15(4): 443-456.

- Bhagwati, J. and Arvind Panagariya
1996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Strangers, Friends, or Foes?" pp. 1-78 in J. Bhagwati and A. Panagariya (eds.),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 Bowles, S. and Herbert Gintis
1998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y: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19(1): 3-25.
- Brown, D., Alan V. Deardorff, and Robert M. Stern
2003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Policy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World Economy* 26(6): 803-828.
-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Taiwan
2010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Taiwan*.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trade.gov.tw/>
- Corbet, H.
1995 "Why and How the APEC Process Is Working,"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4(4): 1-18.
- Dent, C. M.
2003 "Networking the Region? The Emergence and Impact of Asia-Pacific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Projects," *The Pacific Review* 16(1): 1-28.
2006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Drysdale, P., Andrew Elek, and Hadi Soesastro
1998 "Open Regionalism: The Nature of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 pp. 103-136 in Peter Drysdale and David Vines (eds.), *Europe, East Asia and APEC: A Shared Global Agenda?*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pont, C. and W. F. Huang
2008 "Containing the PTA Wildfire," pp.113-145 in B. Eichengreen, C. Wyplosz, and Y. C. Park (eds.), *China, Asia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inberg, R. (ed.)
2003 *APEC as an Institutio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Feinberg, R.
2008 "Voluntary Multilat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Modificatio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 239-258.
- Frankel, J. A.
1997 *Regional Trading Block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Gallant, N. and Richard Stubbs
1997 "APEC's Dilemmas: Institution-Building around the Pacific Rim," *Pacific Affairs* 70(2): 203-218.

- Goldstein, J., Robert O. Keohane, Miles Kahler,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eds.)
2001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Higgott, R. and Richard Stubbs
1995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APEC versus EAEC in the Asia Pacif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16-535.
- Krasner, S. 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wrence, R. Z.
1996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ee, J. W. and Innwon Park
2005 "Free Trade Areas in East Asia: Discriminatory or Non-Discriminatory," *The World Economy* 28(1): 21-48.
- Mansfield, E.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3): 589-627.
-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1999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Tokyo: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 Ravenhill, J.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13(2): 319-333.
2001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New Bilater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24(2): 299-317.
2007 "Asia's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s," pp. 35-75 in V. K. Aggarwal and M. G. Koo (eds.),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Evolving 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rade, Financi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rlin: Springer.
- Rittberger, V. and Peter Mayer (eds.)
1993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mpson, G. P.
1996 "Compatibility of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Reforming the WTO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6(2): 88-92.
- Sandholtz, W. and Alec Stone Sweet
1998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ff, M. and L. Alan Winters
2003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llay, R. and John Gilbert
2001 *New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 Pacifi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2010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www.worldbank.org/>

Wesley, M.

2001 "APEC's Mid-life Crisis? 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The Pacific Affairs* 74(2): 185-20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03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RTA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Section, Prepared for the Seminar on RTAs and the WTO. November 14. Geneva: WTO Secretariat.

2009 *Draf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o the General Council*.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1, from http://docsonline.wto.org/GEN_highlightBottom.asp. Geneva: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2010 *RTA Databas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formation System (RTA-IS)*. Retrieved January 11, 2010, from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Yamazawa, I.

2000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Zoellick, R.

2001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Remarks before the Kangaroo Group, May 15. France: Strasbourg.

附錄 1

Description of data

母體總數	24,225
國家總數	51
分析年限	1990—2008
資料來源	<p>1. The APEC Project Database (AIMP), APEC (2010e) http://aimp.apec.org/pdb/default.aspx</p> <p>2. RTA Database, WTO (2010)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p> <p>3. The World Bank (2010) http://www.worldbank.org/</p> <p>4.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Taiwan (2010) http://www.trade.gov.tw/</p>
國 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Australia 2. Brunei Darussalam 3. Canada 4. Chile 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 Hong Kong, China 7. Indonesia 8. Japan 9. Republic of Korea 10. Malaysia 11. Mexico 12. New Zealand 13. Papua New Guinea 14. Peru 15.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16. Russian 17. Singapore 18. Taiwan, R.O.C. 19. Thailand 2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1. Vietnam 22. Cambodia 23.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4. Union of Myanmar 25. Costa Rica

	<p>26. Israel 27. El Salvador 28. India 29. European Union 30.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31. Panama 32. Macao, China 33. Pakistan 34. Guatemala 35. Honduras 36. Nicaragua 38.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rade Agreement 39. Andean Community 40. Armenia 41. Georgia 42. Kyrgyz 43. Ukraine 44. Belarus 45. Kazakhstan 46.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47. Tajikistan 48. Jordan 49. Dominican 50. Bahrain 51. Morocco 52. Oman</p>
變數定義	<p>變數名稱： CTI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CTI 計畫之總數 EC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EC 計畫之總數 TP_UN：當年度兩配對國執行 CTI 和 EC 計畫的聯集數目 SumXM GDP：當年度兩配對國之貿易占其 GDP 比例加總 AccuFTA_S：截至當年度兩配對國向 WTO 登記之 BFTAs 數目累計加總</p> <p>傀儡變數： FTA：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簽訂 FTA Coding - 0：否；1：是 Embassy：當年度兩配對國是否互設大使館 Coding - 0：否；1：是 SD0308：2003 至 2008 年間傀儡變數 Coding - 0：否；1：是 APEC：當年度兩配對國之一是否為 APEC 會員國 Coding - 0：無會員國；1：至少有一個為會員國</p>

附錄 2

1. 將下列三個模型跑 robust regression 來檢測模型的穩健程度，發現其結果與 OLS regression 一致。

Robust Regression

變數 名稱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EC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EC 計畫數	
	β	Robust Std. Error	β	Robust Std. Error	β	Robust Std. Error
Constant	-1.310***	.055	-1.388***	.058	-2.698***	.109
FTA	-1.307***	.123	-1.712***	.159	-3.019***	.277
Accu FTAs	.109***	.005	.107***	.006	.216***	.011
SD0308	5.556***	.803	7.544***	.759	13.100***	1.445
Embassy	1.635***	.052	2.152***	.063	3.788***	.110
SumXMGDP	.003***	.000	.002***	.000	.005***	.000
APEC	1.200***	.031	1.718***	.040	2.919***	.068
	F=382.68***		F=519.61***		F=499.05***	
	R ² =.132		R ² =.145		R ² =.149	
	N=24225		N=24225		N=24225	

Note: *** → p<0.001

2. 我們將時間的影響同時考慮進來，檢驗自變數是否會隨著時間而對於依變數有不同的影響。由於資料的建構為 panel data 形式，於是我們同時檢測模型在固定效果以及隨機效果之下有何不同，最後並跑 Hausman 檢定來看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那一個比較有效。經 Hausman 檢定看來，固定效果模型是比較有效的，在本文表 11 呈現。

Random-effect regression—國家配對組數：1275 組；年變數：1990~2008，共 19 年。

變數 名稱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EC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EC 計畫數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β	Std. Error
Constant	-1.651***	.088	-1.714***	.113	-3.356***	.195
FTA	-1.162***	.246	-1.870***	.278	-3.021***	.493
Accu FTAs	.193***	.004	.209***	.005	.405***	.009
SD0308	3.510***	.395	5.243***	.447	8.687***	.792
Embassy	1.832***	.112	2.419***	.152	4.269***	.259
SumXMGDP	.004***	.000	.004***	.000	.007***	.001
APEC	.657***	.074	.954***	.088	1.550***	.155
	Wald chi2(6)= 3141.93***		Wald chi2(6)= 2996.34***		Wald chi2(6)= 3443.41***	
	R ² : within=.117 between=.130 overall=.116		R ² : within=.108 between=.149 overall=.125		R ² : within=.125 between=.142 overall=.128	
	國家配對組數: 1275 組 年變數: 1990~2008, 共 19 年		國家配對組數: 1275 組 年變數: 1990~2008, 共 19 年		國家配對組數: 1275 組 年變數: 1990~2008, 共 19 年	

Note: *** → p < 0.001

Hausman test : 檢驗該模型較適合固定效果模型或是隨機效果模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EC 計畫數	Dep: 兩配對國執行 APEC CTI+EC 計畫數
chi2(5)	305.25	220.31	281.24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結果	Ho: 使用隨機效果模型來檢測其效果與使用固定效果模型一致 三個模型檢測結果皆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較適合使用固定效果模型。		

The Impact of Signing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David W. F.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usually assumed that the signing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BFTAs) will undermine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agenda and internal operations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call it the “undermining hypothesis”). Using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es on massive volumes of archive data from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his paper aims to verify the above “undermining hypothesis.” Contrary to the common expectations, I find that APEC lead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perhaps due to various BFTAs activities, are less likely to emphasize the core agenda of APEC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TILF), but more likely to stress another core agenda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ECOTECH). However, there is no tradeoff effect between their emphasis on TILF and that on the ECOTECH agenda. Moreover, in the implementation record of APEC projects, I find that in any given year, if a pair of countries (APEC economies themselves, or non-members) register BFTA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n the number of their APEC projects implemented is reduced. However, in any given year, the greater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BFTAs for a pair of countries,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APEC projects they implement. This latter finding is not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the “undermining hypothesis,” as it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greater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BFTAs

is signed, the greater the need to implement APEC projects. Indeed, many APEC projects are considered by member economies as preconditions, facilitators, or side payments for them to push forward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agenda. Therefore, it is likely that when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BFTAs increases, APEC members may feel it necessary to do more APEC projects, and hence the number of APEC project implemented increases. This finding revis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derived from the “undermining hypothesis.”

Key Words: BFTAs, APEC, WTO, conte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gime

